

（历史文献）

谢、彭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 致洛、毛电*

洛、毛：

兰州谢老来电如下：

（一）周来电收到，已拟成方案送贺，尚未复。平津紧张，贺还清沈〔醒〕。

（二）对政府统制，一般人士对国事极关心。对平津事，极不满意政府，甚至漫〔漫〕骂国民党事。

（三）此间已称有头绪，妇女后援会已成立，我们有救国同情者打入内活动。

（四）教育界已收到数名，正在严励进行。教育界救亡组织（救联会法西斯分子太多，占三分之二），进行极困难。

（五）此间群众和前进人士，恐慌更〔观〕望，不敢出头工作。我们现采取促当局开放救亡运动，改造舆论权利。前进人士发动群众、坚决组织，自上而下之各方推动，现正在这样做。

* 此件是谢觉哉、彭加伦给毛泽东、张闻天同志的电报。

标题为编者所加。

(六) 高 (即高金城——编者) 已去河西收容。此间出院有一营〔长〕，已在办事处，准备送来你处。九十七师处局〔闻〕有一批技术人员，该师想利用一些，我没允许。内有卫生部医务主任一人，准备去接来。其他人员，要他们速送西安。

(七) 云阳旅长蒋之师〔连〕长来接头，已详细写了数信，即□□□□请派一、二个做党的秘密工作〔者〕来。

谢、彭

八日

谢、彭一九三七年八月 十八日给中央电*

(一) 此间抗日工作仍甚沉寂，当局虽同意我方所提之意见，然因合作未公开，尚多顾虑，不能断然进行。我们决〔定〕对上层推动，仍不放松中层的发动，加紧下层工作。

(二) 由于此间诸事落后和过分严厉镇压，不但党派〔蒋旅〕□□他们的工作，邓部之杜团，亦极有望，□□停工作。杜曾屡次向我们要人，望即送二个得力的政治干部来，以便去蒋、杜两部工作。

(三) 额济纳旗，我们已派人去工作。宁夏之李韩团〔翰园〕不日也可来兰州。〔王〕教五尚在此等待。凉州专员公署有人来，候在该处。工作□□前进人士亦极少，故工作〔极碍〕手。

(四) 现×个关系有一些□□，妇女抗敌救援会中，已打入我们的人，成绩尚好。教育界亦在开始发动，已有同情者在活动。回民中虽有活动，但成绩尚少。

(五) 西北军队中之工作。鲁师之蒋旅，已派人去接

* 此件是谢觉哉、彭加伦给中央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头，并具体指示，已和我们发生了关系。

(六) 因此地无一党员，我们决先将较前进的人，介绍几人入党，以〔作〕基础。你处能找到甘肃党员或进步分子，望多介绍几个来。

(七) 我们不能进行秘密工作，请找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来。

(八) 此间群众及人士，极关心红军行动，把抗日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连日问者极多，请将最近情形详告。

(九) 要多寄新《解放》或其他刊物来。

(十) 八月份款请汇来，以免我们紧急时，无活动寄〔费〕。

(十一) 在九十七师之干部，已谈〔要〕出一卫生部长，余在清查中。

谢、彭
巧

彭嘉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

——统治阶级对合作抗战的反映
与我党活动情况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裕、毛并转中央：

我们到兰州工作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关于此一时期的工作情形早想写报告来，因交通关系未能建立，所以无法寄来，现将工作以来情形报告如下：

当我们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同情者。贺耀祖态度亦不甚好，对我们极冷淡敷衍，并且歪道理很多。法西斯分子监视很严，各方面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处境非常困难。经过一时期后才站定了脚跟和我们找到了一些同情者，可是党员仍未找到一个。

甘肃共有六百多万人口，回民占两百多万。兰州有十一万多人，回民占两万多。工人很少，兰州主要的算车夫多些，汽车工人有一千多，学生共三千多。群众生活极苦，捐税很重，象鸦片烟每亩地要抽十八元的税，不管种不种都要收，所以有些农民本不想种，但因不种也要出捐，所以也不得不种了。吃鸦片的人到处皆是，无论到什

* 彭嘉伦，即彭加伦。下同。

么地方都可闻得鸦片香味，大有云贵川的风味〔气〕。政府现在又实行鸦片公卖，设特货统治专员，是以每年交省府两千万包办的。无论什么货到兰州都要经过税局估价，照估价抽税，为了要抽些税，价往往估得高。这样，东西就一天天的更加贵起来了。一般的货价比西安的要贵一倍。其它苛捐杂税同样是无奇不有。下面的黑幕极大，象钱粮的问题，上面规定收十块钱的，下面收到二十块钱。地方军队（邓宝珊、鲁大昌的）买东西公开出半价，加上派粮、派草、派工修马路（因西兰路易坏，修路成为经常现象），群众痛苦是不堪言状了。

甘肃群众一般的都极为落后，过去受革命影响很少，进步思想不易反映进去，封建势力还极浓厚，加之过去当局的压迫，所以群众到现在还是非常怕。

兰州有中等学校六所，大学（甘肃学院）一所，连小学共有学生三、四千人。教员校长都是老人，差不多都在甘肃十几年没有出来过的，思想都非常落后，精神非常萎靡，大家都是为了饭碗主义，不敢乱动一下。有些人初去时还有些热情，见到不公平的事还说一说，可是马上就遭到打击，这样经过许多磨折后，什么都消磨下去了，也就糊涂的混下去；有些受不起压迫的就往外跑了。教员讲课不准讲一句课外的话，否则饭碗难保。在同事中也不敢谈一句政治问题，除了谈办太太、起洋楼、打牌吃酒外，什么都不谈。因为法西斯把持教育界，差不多不加入CC和兰衣社的，就不能在教育界立足。所以教育界加入的极多，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学生在教员影响下，也有一部分

加入了的。甘肃的学生本质很好，俭朴、忠实、用功，有许多贫苦学生背炒面来读书。因为革命的思想不易进来，当局又压迫的厉害，所以学生、教〔员〕不敢妄动一下，每天只是埋头读死书。但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是积极参加的，对当局也极不满意，如女师两个学生，愤于救国热情，化装男子留下遗书，逃往前方参加抗日去了。这件事给了甘肃学生很大刺激。

上层中以邓宝珊为最好，贺耀祖次之，民政厅长罗贡华也不错，其他的多是糊涂虫。

邓宝珊政治眼光比较远大些，对我表示最好。关于我们的主张和在甘肃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极表赞成……

贺耀祖政治上比一般的算要开明些，但不及邓，他有许多歪道理，自己很自负的，开口政治，闭口政治，并且无论谈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带上几句国际问题，可是并不高明。他开始对我们谈话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无存在的必要，理由是既是纲领都全是三民主义，故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呢？他认为苏联很危险，内部问题很多，不巩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是由于苏联处于危险的境地，是第三国际命令转变的；认为国共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但那时假使没有日本的进攻，合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合作的长短，要看日本的进攻程度决定。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真理，是不能实现的。他希望将来社会的变化，也不是三民主义的前途，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前途，而会有另一个真理出现，如法国预言家所说的：“将来世界会变成五个大民族”。对抗日，认为中国是不能胜利的，理由是日

本技术太高，中国事事落后。但他主张抵抗，觉得抵抗了，虽是亡国也无遗憾。自芦变发生后，特别是平津失守，南京吃紧的时候，对我们的态度又变了，论调也不象从前，谢老到了更好了一些，渐渐与我接近起来。常去和他谈，提出许多问题，他多半是同意，虽然有些地方不愿爽爽快快地承认，但一般地是同意我们所提出问题的。后来感觉时局紧张，不能容许苟且偷安了，所以他特别着急，对我们提出的本想做，但又感觉障碍太多，人材缺乏。后来他公开地找陇省党部几个特派员（贺、邓、马愚忱、田炯锦、戴愧生）联名欢宴我们。席后座谈很久，正式讨论了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因为贺感觉想不出进行的具体办法，所以这次提出的更具体些：

（一）民运问题：1、开放民主自由。2、改造领导机关（抗敌后援会被法西斯把持）。3、训练干部。4、建立下层组织（原无下层组织）。5、改造舆论（报纸也被法西斯把持）。6、改善人民生活。

（二）整理军队：1、建立部队中的政治工作。2、加紧抗日教育。3、训练干部。4、改善士兵生活。

（三）甘、宁、青、新团结问题：1、在抗日原则上团结合作。2、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中优秀分子。3、打通国际交通。

这些问题提出后，他们都完全同意，每人都发表了很长意见，尤以邓宝珊的意见为好，贺的歪道理也不说了，态度也更诚恳。贺云，共产党是民主运动的祖宗，有丰富的经验，国民党因害怕民运，以致将民运视为畏途，结果

民运就成了共产党的了，现在希望你们多贡献你们的经验。其它特派员也发表意见，也感觉这些问题非常必要。但是因为时局不明朗，合作宣言未发表，进行都多困难，只要中央有命令马上就做。他们提议在合作后，两个中央，要有一个共同委员会来指挥才好，以便统一。关于做工作，两党间的关系，有的主张分开做，有的主张合拢做，此次谈话，算是最恳切的一次，成绩真不错。

罗贡华是民政厅长，谈了很多次，他人虽很滑头，但对我们的主张确很同情，政治上比之高明些。他也注意下层工作，并向我们请教。

教育厅长田炯锦，本地人，留美生，是CC，表面上虽和我们敷衍，实际上非常落后。他主张现在学生还要读死书，不能参加政治运动。现在他在组织“一九三六”（小组组织的名称）以把持教育界，也就是与所谓洋法对抗。

公安局长马志超，表面上与我们敷衍的很好，实际上在兰州，他是法西斯总负责人，对我们行动非常注意，行为极嚣张。他和我们谈的很多，他反对过去我们的主张，但佩服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他对我们的事情是帮了一些忙，如找房子等都费了一些力。但对我们被俘同志，我们要去瞧，他又用许多办法不让我们去。有一时期，因怕扩大我们的影响，到他局子去不愿见，而到夜晚跑到我们住地来。我们曾向老贺要护照和手令，以避免检查。但贺始终未给，而改以派制服警守卫保护，这些警察当然带监视性质的。但因他们上层

不断和我们来往，所以下面也摸不清，许多地方也就马虎起来，不象从前那样，并且还与我们接近。这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事。开始他们总怕扩大我们的影响，老贺来，汽车不停在我们门口，而停到隔壁杨校长公馆门口，并且是很夜深来，马志超也同样，但后来渐渐也无法避免了。

九十七师师长不在，副师长完全是个军人气概，与我们敷衍得尚好。因为他们是保定系，自己也有很多矛盾，所以对我们也不表示太好，也不表示坏，有时候多避免与我们接触。可是对我们被俘同志都待事不错（被俘人员是由他们管）。他们政训处长董仲箴非常狡滑，第一次见面用警告式地说：“你们来了很好，但希望你们来了后，不要变更原状。你们刊物请不要送来，免得发生误会”。又说，国民党近来的确不行了，党的精神已经死了，党内充满了党骗子；你们奋斗的精神真值得佩服，希望你们放弃自己的立场，站到三民主义中去，复兴民族；以后的问题将来再谈。这些问题我们都用很好的态度详细解释和答复，说得无言以对，到第二次见面就不同多了。

马步青曾到兰州要求老贺介绍见面，结果未曾见面。鲁太昌亦到兰州，邓宝珊也允介绍，但因鲁回去太快，亦未曾见。其它中层干部也见了一些，都对我们表示好感，有些极表同情，对我们的事情帮忙的地方也很多。

外路的干部只与陇东的两个专员胡公冕、罗人骥接触过，他们与我们深表同情，极诚恳，要算甘肃干部中最好的份子。

驻甘肃的军队主力要算平凉一带之四十三师和驻兰州之九十七师以及胡宗南之西北补充旅，此外鲁大昌一师，邓宝珊名义上是一军，实则一师，部队很糟。邓的基本队伍，也算是主力，就是杜汉三团，有一千六、七百人，武器也好。杜团长是保定生，过去当教导营长，他想脱离邓宝珊，待把邓的枪械弄到手后想扩充成旅，把力量扩大起来。贺因手下无兵，想拉他。这是在甘肃最有希望的部队。

鲁大昌之主力是蒋云台旅。蒋云台曾在陕西与许权中参加渭南〔华〕暴动，以前是个同志，失败后到甘肃又弄起来了，思想很进步，平常爱看我们的书，多是躲在被窝里面看。当我们经过岷县时，他得到我们的战时政治工作和一些文件、作战命令等，都拿去翻印，每个干部一本，要他们研究。本人对士兵也还不错，信仰很好。这次我们到兰州因不能去他那里，写了一封信去，他就派了一个连长和张期然出来（张系双十二在西救工作，以前是党员，到延安参观回来，自动到蒋部工作），我回去后，拟去瞧他一面，不过他已加入法西斯，原因是过去为应付环境加入的，我们正在切实考察。前许克祥十四师驻在天水一带，听说已经开赴前线去了。此外别无部队。军队中要以九十七师在群众中的名誉最好些，部队教育精神也比较更好。

国民党的法西斯的情形，他们在甘肃都没有什么基础。国民党只有一个省党部空机关，县、区都无组织，最近才派了些由庐山受训回来的人去任县特派员。党员极少，党部在群众中无信仰，群众都讨厌他们，叫他们党骗子、党痞子。省党部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什么工作，那

些特派员多在公馆里面，党部的事多是那些干事在那里作。什么群众组织也没有，与群众全是隔离的。

甘肃的法西斯是朱绍良时代培植起来的，现在总负责人是马志超，军队负责人是杨德亮（补充旅长），地方负责人是胡维藩（学生军训会主任）。他们的主要力量在教育界和补充旅，群众中极少。他们与CC有冲突。CC多是本地的，所以有所谓洋法与土法之分。土法头子是省党部特派员田昆山和教育厅长田炯锦，这次竞选本来胡维藩活动得很厉害，由于补充旅是老法的，九十七师是保定系，所以九十七师与补充旅冲突得很厉害。九十七师排黄埔生和排法，董仲篪（政训处长）在九十七师一点权也没有，到处碰壁，所以董无法可施。当邓宝珊发表兰州警备司令时，为了拉拢法西斯，本拟以杨德亮为副司令，结果九十七师反对未成功，而改为杨派一团任军警督察处。法西斯不满老贺，怪他用法西斯人太少，所以近来有迎朱（绍良）去贺之说。所以法西斯尽量拉马家，挑拨马家与贺冲突。自我们到兰州后，法西小组会特别开得多，内部特别严格。有些法西分子问马志超对我们去怎么办？马答不要妄动，只注意他们行动就行了。法西近来还有这样的论调说，共产党与日本人一样，都是我们的敌人。说主要敌人不是日本，而是苏联。现在他们又准备去抓保安队，对民众运动他们把持着，如抗敌后援会，就完全是法西把持工作。底下层组织有教育界比较好的分子在我们鼓励下，已开始组织教育界抗敌后援会，但被他们一吓又不敢了。兰州法西还是一个太障碍。

青、宁和回民问题，是西北上最重要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贺曾想许多办法拉拢，但仍无结果并且几次碰壁。我们河西军（即西路军——编者注）的失败，更增加了我们进行青海工作的困难。……马步芳和马步青剿共有功，而未得到南京的报酬，加饷未加，想扩充三个师也未准。马步青想当甘肃主席又未到手，非常怀恨，所以与南京冲突非常厉害。前次听说南京要调他们离开青海，他们就立即集中队伍，屯积粮食做好工事，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死不离开青海，如果中央要压迫就和他们干。马步芳与日本有勾结，曾买了一批枪来，共三千多支，到宁夏时，南京去电，要马鸿逵扣留了，马步芳更气，与宁马冲突也更厉害起来。此次马鸿逵派民政厅长李翰园去解决额济纳日本特务机关，马步芳不准他带兵去，结果由他自己派一营人去，解决后，得有两辆铁甲汽车和一些枪械子弹等，这些东西马步芳要，马鸿逵也要。马步芳说是他派人去缴的，马鸿逵说是在他的地方缴的，现在还未解决。几个日本人和十几个汉奸，只把几个次要的解来兰州，重要的被马步芳留下了。李翰园也行动困难，所以早可以到兰州的，但经过很久，迟迟不来，就是为马步芳多方留难的原因。在青海马步芳与马步青及马麟都有冲突，大权全操在马步芳手。马麟不能回西宁，马步青不满意马步芳的专横，青海的干部和群众都极不满意。马步芳因他剥削压迫非常厉害，捐税多而重，群众被刮的很苦，同时群众不敢乱讲一句，否则就要坐牢杀头。干部薪水极少，省政府的委员、厅长都不要〔过〕一月二十余元。县长有刮地皮的，他知

道了就要提款去，例如刮了一千就要提一千零去，所以很多人不愿干，但是又不敢，因为否则马步芳会以毒辣手段对付的。回民中酝酿解放运动极浓，有些前进分子曾经用尽一切方法组织群众，都遭马步芳的压迫。这些前进分子曾采取说服马步芳的办法，但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些用了十多年工夫去感动劝解马，但结果马步芳要危害他的生命，后来一言不敢发了。前青海民政厅长马凤图思想很进步，极同情我们，亦因马步芳不能容纳他的意见，而辞官不做退职回家。在兰州曾接触一些回民先进分子，谈的很多，他们的意见只要把马步芳弄走，一切都有办法，因为主要障碍是马步芳。群众中的组织是不成问题，他们曾做过群众运动，组织过回族青年学会，并起了作用，后被马步芳解散。青海的青年很好，热情很高，有许多因愤于马步芳的压迫逃到外边来，现在因他们做了些工作，力量还是潜伏着的。这些先进分子表示，希望我们给他们政治上的帮助，愿受我们的领导。他们现想组织起来，如国民党允许，就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否则就仍用回教促进会的名誉〔义〕。对民族党他们要求组织，名誉〔义〕想仍用回族青年学会，现有一个已回青海活动，并和我们建立了关系。有些在兰州进行，对马步芳他们最希望调动去抗日，他们认为南京不断用电去催，马步芳不敢不走的，同时他们还可发动群众要求出兵抗日，这是他们想的，恐怕很难做到。至于马步芳见面的问题，也有一个马步芳最亲近的人，叫马汉章，民和县长，在兰州亦与我们会面，谈的很多，允许回去与马步芳说清，再电请我去。

宁夏的关系已找到他的民政厅长李翰园，此人曾是党员，近来对我们还是很好，我回来时尚未见着，这一线索是比较可靠。

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员，去额级〔济〕纳活动。此人思想很好，极同情我们，敢作敢为，很有胆量。他与额级〔济〕纳王公很好，这次是王公来信要他去的。我们给了他具体任务，建立了关系。

收容工作，我们去了后曾由青海解到两批，头一批四、五百人，我们去讲了话，可是法西斯监视得很厉害，后一批系干部未能得见，很快就送去〔走〕了。地方零星收到一些，多是在讨饭的，有病和受了伤都送到医院医治，收了几个到办事处。我们回来时在静宁收容了十一人，发了路费，指定了人负责回苏区，但现在不知怎样了。在青海还有男女两千多，曾屡向贺要，他去电要来，但贺力量不能及，现仍未能弄回。派了两个人去秘密收容，无回信，成绩不知怎样。对医院的慰劳了几回，发了钱并经常去看他们，在医院多半成了残废。流落兰州的不少，多找到了职业，以挑水的多，有的在饭馆做小工。……

我们对西北形势的估计：

（一）好的方面：1，群众忠实、勇敢、纯洁，受坏的影响较少。2，反动力量比较薄弱。3，我们的影响在群众中尚好。4，当局比较开明，对我们尚接近。5，回民与新疆问题的解决，当局多要依靠我们，给我们工作的便利。

（二）坏的方面：1，群众落后，受革命影响少，过

去压迫厉害，不易起来。2，我河西失败坏的影响……。
3，法西斯障碍工作。4，我们没有基础，不容易发动。
5，当局缺乏决心，并且对民运统治的厉害。6，少数民族多，民族仇恨深，不易解决。

此一时期我们采取的工作步骤：

第一步站定脚跟，联络感情，解决合作问题，散布影响。

第二步进一步与各方面接触我同情者，开始注意下层工作和与当局正式讨论各项问题。

第三步推动上层政治的改革，领导同情者，建立各方面的工作和建立外面的关系。

此时期工作成绩：

1、站定了脚，争取公开的设立办事处，与各方面均极融洽，并给了上层以推动（如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有许多都渐渐在实行），如提民主问题，省政府在报告上公开发表了实行民主集权的报告，对培养民运干部就在开始组织训练营，对新问题要求我们派人同去等。

2、增加了同情者，并开始发展了两个党员。

3、派人打入了妇女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并有相当力量，同时正在发动回民和教育界进行救亡组织。

4、开始找到了军队的线索，并开始进行工作。

5、与〔在〕青马、宁马和回民中有了线索，青马较前对我们好些，找到了额级〔济〕纳蒙族关系，并派人去了。

6、收容工作，派了人去河西收容，本地也收容了一些，并对医院中及解来的都进行了慰问。

7、能在他们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

8、政治影响更扩大了，各方面隔膜渐渐化除，同情者日渐增多。

缺点：

1、下属工作建立不够，干部少，群众工作无人做，影响工作的开展。

2、找关系的努力还不够。

3、宣传品缺乏，特别是《解放》许多人抢着看，而我们没有，减少宣传效果。

4、收容工作成绩不大，采用的方法不够。

今后的方针：

1、加紧推动上层，发动中层，深入下层。

2、培养进步分子，建立党的组织。

3、加紧青、宁及回民中工作，组织回民先进分子。

4、创办刊物，改造舆论。

5、加紧军队工作。

6、组织甘肃参观团来延安参观，并送先进分子来求学。

7、争取政府机关，引用前进分子，改造上层机构（邓、贺已同意）

我们向中央建议：

1、立即派得力干部去领导党的工作及军队工作，并设法在西安调些学生（党员）去做学生运动（用转学方法），凡有甘青宁的前进分子多介绍回去工作。

2、及时给我们工作指示和建立很好的交通联系。

3、文件宣传品按时寄去，并望专办一国民刊物，因回民不甚相信我们和不了解我们主张，尤其怀疑我们反宗教。

4、要陇东部队及组织和兰州方面发生关系，以资联络。

以上各节，请中央给我们今后工作的详细指示，并对以前工作给批评。

此致

布礼

彭嘉伦

九月二十三日于西安

谢、彭在兰州 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

(甲) 自宣言发到后，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之问题，均愿照行，如改运输（“运输”疑为“用”之误——编者）我们主张。《西北日报》与《民国日报》合作〔并〕，并以左翼份子主持，贺已允照办，原有贺找来李剑华（我们好的同情者）为主笔，后因建设厅俞伟因贪污去职，将李调建设厅〔任〕主任秘书，贺兼厅长，实际工作是李做，另以王宗孟为主笔。王，益阳人，是自由主义者，与我们说愿接受我们的意见，请我们写文章。现合并问题正在进行中，对我们办刊物问题，贺亦认为必要，愿给以帮助。现西北与民国两报均不断能发我们写的文章，谢老已写了不少。《民国日报》坏的一点，如不愿登朱、彭启事等。此地教育厅长极坏，现仍限制学生活动，贺亦非常讨厌。但因甘肃人包办教育，排斥外籍，贺似不愿开罪他们。贺言外之意，颇愿学生活动一下。对民运贺定无阻挠之意，但不愿由政府提倡。关于政府登用前进分子贺很赞成，但还怕用有色彩的人。我们已正在此间之同志或同情者，开了几个给民厅建厅，争取逐渐改造政治机构。昨日民〔建〕厅李剑华将南

* 此件系谢觉哉、彭加伦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写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是由西安“八办”转抄的。

京最近发下之总动员密令给我们看。据云，省政府派一科准备领导总动员之事，要我们设法推荐一人，但此间找不出得力人才。科员人才可找到几个，但科长找不出，现在西安之设计委员会之谢华、徐炳如二人中是否可抽出一个来，请与之商酌见覆。唯人物贺尚虽避形迹，因此尚没有〔由〕贺直接介绍人。关于电台问题贺回信云：电台是极由〔需〕要合并入行营办公厅电务股，以资划一而省开支。我们认为合并归电务股管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仍能架在自己屋里，把电台速〔运〕来。民政厅长罗贡华近更接近我们，对我们表示说：“我和你们的主张是一样的，你们有意见，望多对主席说。”我知道的，对邓宝珊我们的推动，他也不想干一下，但又恐怕没把握，昨日南京命他任二十一路军团指挥官，由他自己抽一旅，管团之十旅不动，鲁大昌抽一旅，九十七师抽一千五百人，补充旅抽一个团，经神木、府谷等地上前线。闻邓定十六日到西安，他希望我们与之建立联系，或者派人到延安联络。近来向邓接近经过汤昭武，效力似乎好一点。在未出发前，拟公开去会一次。法西〔斯〕亦比前较好些，唯□□虽然不象西安那样讨厌，然而多少给我们麻烦。关于两总的启事在《民国日报》上至今仍未登。

（乙）地方党的工作，自孙作宾到后，已找到十余人。过去的同志经过考查无问题，已编成三组，正在工作中。西安调来之学生有两个已到此地，正在设法入校，还有一个刘同〔日〕修尚未到，望告张心如要他速要。

（丙）此间群众运动并令〔至今〕仍未发动，妇女后

援会没有基础，只有几位太太，阎〔自〕嘉隆〔加伦〕走后日见消沉，会有解散危险。回民工作及教育界近来亦消沉下去了，现正设法推动医学。省外留学生已成立一旅外同学会，有我们同志在内工作，因内部有坏分子捣乱，专〔亦〕如无的作用，现正加强其工作中。青马关系，见过马步青，他表示尚好。马步青之代表亦曾见过，表示亦尚好，现设法疏解。派人去青一次，曾昭示表现尚好，现开始进行军人中之工作。

（丁）贺意希望新疆出兵，可出至西安，以资策应，拟派人随小舟去，因飞机坐不下，决在后再去。对出兵问题，望中央再电告新相商量。

（戊）李杜等一群仍在此等，前电收到否？请洛、毛速办。李电蒋，新疆难去，则请蒋派机由兰州飞塑〔塔〕城，蒋尚未覆。

（己）加伦的报告收到否？对此间工作望详加指示。

（庚）最近情报，望迅速由丹元见告，新的《解放》亦望迅速寄来。

谢、彭 寒午

近日工作情形报告*

林老转洛、毛

近日工作情形如下：

(一) 青年工作正在开展，已开始组织抗战团，各校学生均参加，情绪极高。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现发展到四、五十人，均在我们影响下，现正筹备出刊物。

(二) 抗敌后援会亦全在我们影响下，会员近有增加，工作进行甚好，亦决定出刊物，并要我们写文章。

(三) 党的组织也有发展，现已建立了四、五个组。

(四) 同情者增加不少，每日来办事处者甚多。省政府上层也有我们的人。

(五) 回民工作……最好能多调几个回民干部来。

(六) 此间舆论在转变，我们忙于写文章，几个刊物都向我们要稿子，现《西北日报》登我们的文章不少。现我们经过灰色同志把《西北日报》的《大众论坛》一版已写过来了，完全是我们写的文章。因为写文章的人太少，同时青年及妇女刊物均能在我们影响下，《大众论坛》转过来了，故自己办刊物暂缓进行。

(七) 青年方面关系尚未弄好，现正设法进行中。

* 此件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给中央的报告。

(八) 此间群众特别是上层一些人，对我们的舆论极好。都说第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将来收复华北、东北和保卫西北，还要靠第八路〔军〕。贺耀祖在省府会议〔上〕提出对我们抗日十大纲领的批评，说各党各派及国防政府的下些字眼不妥。有委员发言论〔说〕，将来要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当然是无疑的，但是可惜他们的手段太激。有些人说西北没有共产党来做是弄不好的，将来西北是共产党的。

(九) 由于我们近日活动的比较厉害，法西斯和西西开了会，说“我们再不要磨擦了，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并且决定，以后“凡是共产党的言论，尽量设法不使他发表出去，刊物设法把他检查掉。”目〔日〕前，贺来信说，《新中华报》内容有应商榷处，并须办登记手续，否则难于发行。当答复该报是否已登记，请向该报详查，致内容如有不对请指示，当为转达。这大概是西西要贺做的，现尚无回信。

(十) ×团已派窦志安和雷明工作去了。蒋旅因环境关系，尚不可能派人去。

(十一) 杨干丞派来五个军事干部必须收纳。杨本人倾向我们，他还想选送汉民、回民一批学生到延受训练，因路费无着。假使他们派的人空回返，以后该方的工作将难进行。

(十二) 根据目前情形，除党的工作计划依照完成外，我们决将下列方法：(1) 与法西斯西西公开谈判，求得妥协，使彼(?) 讲不相信，求得我们能巩固群众基

础。(2)组织左翼分子用国民党左派出面，特别是着重省府与各机关的左翼分子和贺的左右，以形成一种力量去包围老贺和左右甘肃局面，控制法西斯。(3)加强下层工作，就现有基础求得迅速的开展，巩固在群众中的基础。(4)用极大力量做改造舆论工作，抓紧《大〔众〕论坛》及青年及妇女刊物来扩大宣传，造成强有力。

(十三)请中央快派些甘肃干部来，并对此间工作给以指示。

(十四)此间极需电台，望速派来。

(十五)青年刊物须我们每月津贴百元。又我们准备开一书店印刷，因此间青年买前进书籍的近日正多。准备三百元左右，此间可募二百元，我们必须拿出一百元之谱。可否请决定。

谢觉哉、彭加伦给中央 的 报 告*

洛、毛并转中央：

……

甘肃的环境虽比前更好些，但国民党对抗敌救亡工作的压制统制〔治〕仍非常厉害。他们的办法是在某群众团体刚要成立时，就造出许多谣言，派些份子进去破坏，或将出头组织的一些人找去给以威胁，加以一顶红帽子。如果威胁不成功，就用派指导员的名誉〔义〕，派人来把持操纵监视，给以多方的为难，并进行收买分化手段。如过去教职员团体，在我们策动下，刚想组织，就被吓散了。此次学生抗战队（是我们同情者组织的），开始想用威吓手段，把他们负责人找去说：“你们与办事处有关系，你们的主张与共产党主张一样。”学生当时答复的很好，使他无法，后来成立了，派人监视，抗战队就索性全部搬到省党部去办公，在他们大礼堂公开开讨论会，讨论救亡抗日问题，表面上一切和他们敷衍的很好，故至今不但还能存在，而且日趋发展，并且争取到了在省党部的机关报上出

• 此件系谢觉哉、彭加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给中央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副刊——抗战生活。这样使过去所包办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渐渐失去作用，抗战〔队〕渐渐起而代之。

省外留学生抗战团，有几十个人，内中分子非常复杂，有杨立奎的走狗，有蓝衣，也有CC。我们有一个同志打进去了，内中有两三个同情我们的进步分子。开始全在坏分子把持中，省党部曾用许多手段来拉拢，要他们全部加入国民党，经过内部的争论，多数不愿加入。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同时这些意志又薄弱，所以我们也不愿他们加入，因这样的群众打入去，对我们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党部想破坏这团体，利用内中一些坏分子，发动向政府请愿，惩办贪污（建厅秘书贪污买皮衣钱数万元，扣留后未办），使政府非常不满，教育厅长（CC）即找他们去训话，指出他们请求惩办贪污的错误，是反政府的行为，要他〔们〕都回学校读书去。这样一来，引起全体恐惧，纷纷想离开兰州。有的想上前方，有的想回原校，有些想到陕北。经过我们的鼓励与解释，并指出此一阴谋，和告诉他们应付办法，要他〔们〕第一向当局说明自己的态度，解释请愿的意思完全出于爱国热情，并无与政府对立的意思。第二，团结内部。第三，加紧救亡工作，并联络各校学生取得援助。但那些坏分子要走让他走，结果不但稳定〔了〕这个团体，并且坏分子多数走了，我们的分子插进了领导机关，现全在我们影响下。

妇女后援会，开始时也是一些太太把持，教育厅长亦想许多办法来破坏。可是这一团体是贺太太领导的，我们打入了一个同志。由于我们运用了灵活的工作方法，取得

了贺太太的信仰，现在那些太太跑了，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个同志帮助贺太太支持着，我们这个同志成了妇女后援会的主要角色。虽然群众不多（百余人女学生），然而这些学生尽成了我们同志的群众，我们同志的干事就有二十多个。现在工作进行尚顺利，已出版了《妇女旬刊》，贺太太正社长，我们同志副社长。但编辑等工作概须倚赖我们的同志，稿子全仰给于我们。该会权全操在我们手里，本来可以迅速开展工作，但至今下层基础仍很弱，原因是我们这个是新同志，很少经验。一切工作我们不给他指导帮助，他就无办法，甚至于在开始时，每天要告诉他怎样提意见，怎么说话。现在是好了一些，可以单独工作，然而一个人没有帮手。此间女学生太差，正在训练干部，最好能从西安调两三人来就更有办法。

此外还有一个读书会，已有会员六、七十人，各校都有人参加。这些会员，极大多数是我们的同情者，他们工作的很好，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看社会科学书，讨论抗日问题。已讨论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情绪极高。他们现在也自己募集了一些钱办刊物——《西北青年》，主要文章也要我们供给，他们会员也大家都写。

党员的发展已建立了一个街道支部，还有一个小组，共有二十余人。近来还找到了一些农民工人关系。有几个学校已有了党员。

现在正计划开展店员学徒工人中的工作，因为过去“双十二”在西安没有注意此工作，以致在下层基础很少，现在我们已着重注意这一工作。

军队工作，除蒋云台旅已开往苏区，请你们派人去工作外，杜团已派雷明去工作。对杜团工作有一详细布置，并给了雷明以详细指示，杜情绪亦甚高。但因雷明性急，和杜过于兴奋，把雷公开了，结果引起法西〔斯〕特别注意，便特别对该部防范，这当然不好工作了，反而要影响杜本人的地位，我们已严格给了雷明以批评。为了挽救这一缺点，决将雷调回，并告杜以应付方法，已去电要杜来兰商量。请另派一好的干部来，再到杜处去。

贺耀祖想成立军队，创造实力，已准备编五个保安团，现又想利用公程大队名誉掩护，已在省府办一军官教导队和军士队，并聘请了我们一个同志（在省府当编辑室主任）当政治教官。教材及计划我们均已商妥，决定大力进行这些军官学生的工作，争取他们，使将来成立部队掌握在我们手上。但可惜只他一人，很难多接近学生。此间又无干部，否则我们可以打入很多人进去工作，那收效更大了。打进去是不成问题的。

杨干臣是过去保安队长，近很同情我们。因不满意贺等的干法，知道西北危机，想干起来，据云贺想造实力正在拉他，允许给他编一团人，但经过一、二个月尚无下落。他现一方面争取此事成功，另外则想在外县自己去活动，把下层组织好，等到西北打响时就揭竿而起。但他感觉没有干部，要求我们来二十个干部，他可负责介绍到外县去安插秘密活动。他并准〔备〕也送二十个干部到抗大学习（原拟送一百），人虽有，但无路费。此人抗日决心是有的，对我们也极同情，亦无其他政治背景，……我想

此人是可利用的，因为我们在这边建立武装部队是极需要的。

同情者此间尚不少，但无法组织起来，同时其中真正干的，大胆的人仍极少，我们正在设法使他们积极起来和组织起来。

甘肃的舆论是日趋改善了，比前是有了相当进步。我们与《西北日报》关系很好，我们许多八路军消息及我们写的文章都能发表。连彭德怀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先决问题》也发表了。在该报有一副刊——《大众论坛》，已完全在我们手中，全部稿都是我们写的，影响相当大。《民国日报》的《政治与社会》副刊也登载我们的文章。现在我们已过着大部分写文章的生活了，可惜只我们两个，写不了多少，供不应求，能调一个同志来专门做此工作就更好。

现〔在〕我们正计划利用与贺关系密切之灰色人〔物〕，把整个《西北日报》拿过来，用我们的人去当总编辑，若能办到收效当还更大。

前一时期，由于我们活动较厉害些，他们即制造许多谣言，说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政府。他们自己派人贴标语，“打倒兰中校长”，说也是共产党干的。这些谣言传的很盛，贺也有些相信。我们马上在报上发表了文章，揭破他们这一阴谋，老贺看〔了〕也无可如何〔地〕说：“共产党真是会因时制宜”。同时我们到省党部省政府到处去很诚恳的（地）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揭露这些问题，使他们无法。这些阴谋被打破了。

由于西安的教训，我们注意到了尽量避免摩擦的问题，近来我们经常与省党部接〔头〕，经常苦口婆心的〔地〕向他们说服，并提出许多西北抗日救亡意见，近日比前好的多了。他们虽然内心还是那样干，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意见的正确，并且允以共同讨论，并再三说明他们以后决不压迫群众运动了，并说谁去做都可以。我们现在都尽力设法使他通上好的路上，这有可能，因为里边还有几个可容说话的人。

朱绍良来，贺极感不安，现一方面正想造实力，一方面好象也想干一下。前天他找包道平（贺的同乡，较进步）去，要他起草组织民众战时经济、战时教育计划，包又跑来要我们帮他写，这证明贺现在也有些觉悟了。

我们现正利用朱、贺矛盾，抓住贺周围亲信，利用他们升官发财心理去包围贺，使他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另外对朱绍良亦尽量去拉拢和影响他。

回民工作至今未有成绩，还是一些个别关系，……

我们现除加紧此地群众工作外，现在特别着重开辟河西工作。因为估计敌人威胁陕北时，我们的退步，准备打下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可是这一工作当然极困难，但我们当尽力去进行，加伦拟日内到河〔西〕去一次。此外我们特别注意争取军队工作和创造军队工作，除杨干臣外，正在多找关系。

我们到此以来，很少得到中央的指示，因为我们在此不象别处办事处，事务工作较少，主要地是进行以上这些工作，希望中央多给我们指示，使工作更能收得效果。

此间极需要一个电台，架设已不成问题，请速派一个电台来，或电新疆代远同志弄一个来更好。

此间要《解放》及我们的刊物书籍的甚多，请嘱新华书局多写〔寄〕些来，钱由西安办事处在我们经费项下扣。近日来的《解放》每次只几份，不但不能卖，连自己看也不够。这种好的宣传机〔会〕不应忽视。

党最近有无新的决议和文件，均请各检数份寄来。余后告，请速给我们工作指示。

顺致

布礼

谢 觉 哉
彭 加 伦

十二月二日晚

十二月十一日兰州谢、彭来电

洛、毛：

甲、朱绍良尚无政见发表，政府人员据谈将全改组，前因上层关系建立的工作，不免受到影响。

乙、此间代表是否改任能俄语者或和朱有关系（或派一翻译来）。

丙、青马对人表示有转好意，已由关系人去一信，如回信，拟去接洽一回，那边被俘的人尚有一些。

丁、宁夏来人谈：

（一）宁夏派一旅去磴口，沿途逃去一半。

（二）民众痛苦太深，……

（三）临河有挺进军、国民军等复杂部队。×××的挺进军象土匪，遇敌便逃，人呼为挺后军。

（四）□宁间仅□□驻辩〔有〕九十七师一部。

谢、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谢觉哉同志报告*

报告：政治方面——省府人员朱绍良优柔寡断，同贺耀祖差不多，到任许久，没有发表过具体政见，更没有具体设施，对我们陈述的意见，也是口头上接受。举一事可见一般，《解放》报在兰州发行，贺耀祖时已得中宣部电准，林老又有电致朱，我处〔又〕迭催，到今天还没答复。据省府传出：“不准不好，准也不好”，这样一件事把他难倒了。（实际《解放》报只要有，要的很多，书店怕党部干涉不敢挂牌推销）。省府人传朱有烟癖。民〔政〕厅长罗贡华能讲几句政治话，但观点不正。他曾发明“民主、集权、独裁”三位一体的学说。对陇东区曾说：“边区政府向甘肃蚕食”，“各县长守土有责”的话。曾说：“我的主张与共产党差不多”。实际罗是防共最力的。罗过去曾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教育厅〔长〕葛武桀（蓝衣）新到不久，因其非甘肃人，大受教育界反对。教育界说他不该骂甘肃人文化低。固然谈话，葛也没有什么教育政见发表。建〔设〕厅长陈体诚是中经委的，外出时多，尚没什么表现，外只传说他用飞机送哈密瓜，〔和〕他准备娶为妾的妓女的密话。省府各厅长，财厅梁敬梓〔孳〕是贺〔在〕

* 此件系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谢觉哉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

任时发表，朱就职后才到的。朱保水梓（甘肃教〔育〕界，田炯锦一派，水梓一派）教〔育〕厅长，许显〔显〕时建〔设〕厅〔长〕，但中央发表的是陈、葛。朱想用毛炳文长民厅，罗贡华见机辞职，被蒋慰留，此事朱很不快，各厅长没有朱自己的人。因此，他们团结很差，有“不合作也不〔不〕合作”的话。省府及八战区司令部人员，我们谈过的只一军佐科长何晓宣，六十多岁了，还有点头脑，有点英气。一般是不大关心政治。有一次民厅科员某来我处谈，我们告诉他军委第六部发布的二十条纲领，某科员回去告诉民厅长，厅长才忙找报看，可是报不见了，到报馆里也没找着，当夜写信来问我们，到底〔在〕哪一天的报上，可见省府对政治注意的一般。

省党部，特派员有些是挂名的，经常在省党部的，一杨集瀛，好好先生。他说：“我们党部是承上启下的，没什么工作”。同他谈什么事，他说“我们管不到”。这是位说实话的人。一马退〔愚〕忱（东北人），青帮首领，对办党不大了了。一李少陵，长沙人，原胡宗南部下，能说几句，但没有头脑，对防共颇热心，在军官队讨论教官时，他说要注意教官人格，假如混进一“老共”来，那一切就完了。李为赚钱计，一面做特派员，一面又在教厅做秘书主任。一马焕文（回教），说话尚诚实，想做事，但想不出办法，又不想采用他人的办法。

军队方面，孔令恂两团，一驻中卫，一驻兰州。杨德亮（回教）两团，一骑兵团驻甘草店，一步兵团驻兰州。鲁大昌两旅，开陕北，现尚住在陇东等地，一旅留在陇

南。四十三师两团，驻平凉及西峰。邓宝珊的新一军，一旅留在定西等处，一旅随邓出发，全军只六千多人。鲁邓等地方部队，纪律坏，就地派粮，只给半价。据贺耀祖说，省府明知其饷太少，但无法发足，他们也不要求发足，大概他们自由向人民取法还便利些。各军事长官，杨德亮对我们最坏，时常对士兵说反共的话。×××也不好，新安旅行团在平凉因携有《解放》即被干涉。邓宝珊是明白人……，邓部杜团，鲁部蒋旅和我们有些关系。

有所谓“在乡军人”……他们要求编队，贺曾委马公章、王子元等做保安队长，叫他们去编，朱把他们的职务取消，这些人现没出路。据红帮说，红帮人最多，有二、三十万，首领为吴慕唐（做过省府交际主任），他们自称有〔很〕多枪，固然不免牛皮，但潜力确不小。这些人不去应征壮丁，又想自成一系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政府尚没处置方法。

征兵〔与〕救国公债，同其他地方一样，救债的摊派，征兵是买。救债按户派，出钱人不知道是债，派的数目常比该处总的销数要多。马志超说过：“有钱的不出钱，没有钱的出钱，有钱的还要捞几个”，大概是实话。买兵贵到四、五百元一名，收了这些钱，由各区长去雇，区长有因此发几千元财的（《西北日报》记者说的）。雇的人逃了，又要雇，补雇又要派钱。某君曾问农民，农民说：“征兵不得了，一次还可，征到无数次”。逃的壮丁捉住了就杀，但逃的仍多。

中央所已〔以〕顾到这点，近已减少征丁数目，增发农贷五百万。不过农贷能否做好是一件事。据第一期农贷报告，佃农借到的数目，仍占百分之八，可见真的穷人得益不多。又甘肃高利贷百分之千的利息是常事，政府虽讨论过，因怕富农地主发生反感，不敢取缔。官吏贪污很普遍，比东南要黑暗得多。有人说在甘肃做不得好官，好官必然得坏名声，且站不住脚，坏官不仅跑红，且有好名声。最近土匪及保安队叛变事很多，这与救债摊派征兵很有关系。

教育，历来拒绝外省人，新的空气不能输入。举个极端的例子：中学生打屁股，课本上的白话，教员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释。学校员生间找不出生气。前任教厅长田炯锦说：“甘肃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又对我们说：“你们讲的很好，等战争过去再说吧！”。可见其思想的一般。葛武棨来后，与教〔育〕界冲突很烈，教育界宣言反葛。只是吃饭问题，因葛带了些人，怕动摇他们的生命线，双方对教育改进都没提及。

民运问题，仍是统治办法。开〔闻〕动员委员会开会，主张除中央有明令应付外，其他概不准（大概在白〔崇禧〕来之前）。自来召各机关训话，检查战争失败的教训，说动员民众非常必要，但白不深知西北情形，只讲了广西一些经验。目下省府对民运空气颇有转变，在起草民运章程（他们看章程看的很重）。但公开讨论及征集意见还谈不到。此间新成立的民众团体，有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分会，伊斯兰学会等，作用尚不

大，原因是青年热心有余，有能力的太〔少〕。甘肃过去教育的腐败，应负其咎。

报纸刊物。《甘肃民国日报》——省党部的。《西北日报》——省政府的。是甘肃仅有的大报。每天各出一小张又半，也只有他们有象样的印刷场〔厂〕。《民国日报》是CC的，《西北日报》是蓝衣的。以前《西北日报》要进步点，我们可化名写文章，有一个时期，有一个副刊全归我们编，得到读者拥护。近来社长换了（据说登我们的文章，蓝衣把他换的）。《西北日报》乃落到《民国日报》之后。《民国日报》以前我们也可化名写文章，后因篇幅缩小乃不可能。对八路军消息都不愿登。最近中宣部令两报合并，但两派以地盘之故，恐难实现。我们出版《西北青年》旬刊，虽仅及三期，已取得社会好评，订阅较多，经费靠捐募或各个青年自己拿出来。留外学生抗战团出《热血》周刊，不大好，背景是CC。“妇慰”出《妇女旬刊》，无背景。因此地写的人少，主编者都秘密找我们写文章。新自外来的文化人丛德滋、吴渤及此间左翼王洽民等，筹备通讯社等及刊物，大概不日可出版。剧团原有联合剧团，办得不大好，近有从上海来的几个人演了几次“放下你的鞭子”，打破了此间空气。新安旅行团也将在此演剧，这方面当有进展。顾颉刚等在此出版《老百姓》，系通俗刊物，已出版三期，外县也有几种油印报，没甚内容。

兰州不易买到新书，过去自生活书店来的书，检查员加以左倾戳子，就没收了。最近好了些（据报我们来往的

信，检查员都抄去了，《救国时报》仍是扣留，检查所在蓝衣社手里）。一个书摊子叫“新生”，间〔或〕来几本新书，门市很热闹。《第八路军》（内容并不好）的牌子挂出，几个钟头就卖完了。新书照定价还要加邮费，买的人满不在乎。《新华日报》已有人叫卖，订阅的也有些，《群众》市上已有卖。卖新书可赚钱，已有人在组织书店。

各派系。甘肃派别怕是很多的了。除兰、C外，还有不少地方派别。CC与蓝衣冲突利〔厉〕害，为的是地盘。近来CC和我们态度还好，蓝衣较坏点。国民党党员的会议是没有的，谁是党员也不一定记得。“有党部无党员”，他们自己这样说。但蓝衣是有会议的，会议内容不外是地位分配的保持。传说入社很简单，向蒋像三鞠躬，宣誓拥护领袖，社内允保障他的生活就完事。蓝衣社只马志超和我们表面还好，九十七师政训〔处〕主任董仲篪与我同乡，但见我〔却〕避而不谈，像有深仇者。杨德亮常发反共言论。此间负责人一说是李才桂，一说是胡维凡〔藩〕，尚不清楚。

对共产党，人说剿共时期已过去，代之而为“防共时期”。现在，防共时期大概还未过去。前一月，外间尚有撤销办事处及暗杀团的谣言。即到现在，我们为调解葛武棨与教界冲突，须与省党部谈话，某特派员尚不肯以国〔民〕党名义正式和我们谈话。某次送宣言到杨德亮师部，要把来人对〔扣〕留。然而事实逼着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成见，表面维持对我们的好感。至于民众学生及

政教方面，较进步人物受我们影响很深。每天有些人来听取政见，认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救中国”，“不是八路军在晋北打，西北早没有了”。有的说共产党何不快点干，抓几个省到手里。有的直接〔要求〕加入共产党，说国民党名为大党，实际共产党是大党。

民众痛苦。甘肃吏治黑暗，可以考得头名。举几个例子，高利贷有借十元每天出息一元者，不怕你不还，有警察替它追索。去年派大车运汽油，某甲派车一辆，甲长赚到五十元。特货统制处，贺时规定，以五毛一两买六十万两，后加之〔至〕一元（时价二元多）。不管你家有无烟土，总是照派，弄得鬼哭神嚎（我曾向贺说，后来取消了）。有一次省府向凉州要骆驼三百匹，马步青批准交商会，商会按户摊派。等到把骆驼送县府，县府不收，责令每匹折洋二百元，由公家雇。有自布隆吉来的说，那里原有二、三百户，现只二、三十户，只一户有饭吃，将须〔快〕要逃光，豪劣贪污，交相为害。

少数民族。宁马，据李汉〔翰〕园说，他没有抗日的力，也没有降日的胆。周翔〔祥〕生自宁夏来说，对宁马最高估计是“骑墙”。敌机尚没炸过宁夏，有一次掉〔投〕了一封致马的信。又据人说，宁马集资不少，宁夏岁收得八百万，中央月补助十六万，全年除军费外开支〔约〕二百万。又马统治鸦片买卖，年收亦数百万。宁夏户口逐渐消耗，现只六十多万人，且穷得利〔厉〕害。……前次宁马开一旅到磴口，逃的很多。河西、青海，汉人固不能生，回民也很怨恨。我们遇到的回人，没有对马家有好感

的。去年截获日本去安西设特务机关的人（李汉〔翰〕因截获的），引路人是西宁商人。据说，此商如不得马同意，必不敢为此。又军政部要甘、宁、青办三十万〔套〕皮衣，宁马、青马都拒绝，仅贺在兰州市大德源办三万套，现才办齐。朱及〔在〕此次〔和〕白往宁、青，听说也只疏通一下。额济纳地盘很宽，人口四千多，内有二千多是外蒙革命时移来的，不负租税义务，向他要他就走。图王头脑简单，可中可日，但不喜欢外蒙。李才桂（军事专员）到那里，全是大汉族主义的办法，和图王冲突，现李已回兰，图王也到了青海。李在额的军队（一百多蒙兵）有一部哗变，李才桂准备回额，唯宁马不喜欢他，怕还有问题。阿拉善达王，较有势力，有三几千兵，前同国民军打过。达王生长北京，是溥仪妹夫，与德王有勾结。达王意思是中〔央〕政府没有好意，降日至少可保全终身王位。他曾扣留由百灵庙送去青海的枪械一批，后来送还了，这不是反对汉奸，而是要揭破，你们不当汉奸的也是如此。

有两位回族的绅士说：中央只拉拢回族的有枪头子是不够的。回族不是他们几个人能决定的，他们没有教权。回汉间却有不平等之处，回族占甘肃人口三分之一，但在政府服务的很少。兰州二千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回族只占许多。交通状况。交通是最坏不过了。甘新路，把款子交把款给马步青，民众得不到一个钱，还要带饭、挨鞭子，或者出钱免役。桥院路面寒冷没弄好，冻得松就不可

走。西兰路是“稀烂”路，雨季得〔走〕一、二十天，钱花的比铁路差不多，还在征工铺路面。运输处管辖下的汽车四百多辆，坏了三百多辆，这些车子都是苏联的工人驾了不坏的，现由苏联工人直送咸阳。对外宾招待更坏得很，谭局长甚至说不要取得苏联人的好感。

根据上述情形，西北的确很危险。敌人来攻，一无所有；就不来攻，也可能酿成民变。上面的人很麻木，有的说我们以后要牺牲，今天不妨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稳了，且趁时弄几个；多数是模模糊糊，得过且过。群众运动有了始基，但因青年知识落后，一下子要长成〔有〕能力的人是不可能，必须上面的人能负得起推动责任来才行，无奈现在的党政人员，希望太少。阿拉善、额济纳、宁马、青马动摇是无疑义的，但如陕甘方面确有抗敌力量和准备，他们离心倾向是可以减弱的。又政府至现在尚没有民族平等的办法颁布，仅靠上层拉拢是不〔能〕够转移危险的。

陇东方面，除前次电告外，已向朱提出组织陇东动员分会，应有双方的人参加，朱现尚无答复。朱前去，为避免冲突，已令各县长如不能解决的事件，应告省府，不要逞直行动，发生误会。

办事处工作。我们初来，这里是一块荒地，甚至有人看见我，才相信共产党老的要杀是假的。现〔在〕社会对我们信仰颇高，各机关接洽表面满好。嘉隆〔加伦〕同志交际方面尚行，处事有决断。……

觉哉 二月九日

谢、伍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致洛甫同志电*

洛甫同志：

（一）过去西路军失败的同志，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约四百余，编为工作〔兵〕营，现在甘洲〔州〕一带修路，困苦极了，许多因受冻连脚趾都掉了，请中央设法营救。于一军□□中，都有我们少数同志想归队，而不可得。若向他们要人时，即说无那些人。我们跟他们另外调动，或给以不好的对待，向无确报。

（二）青马态度很坏，派了许多便衣到各地搜查我们同志，据多数人传说：被杀死者仍不断发生。青海来说：被俘虏的，残废及病的都杀了。他部下的军官谈：日本来了无甚问题，如果红军及苏联的兵来了那就了不的〔得〕。对我们极仇视。有位高固亭（即高金城一编者）者是医生，冯玉祥时的医院院长，颇有社会地位，很同情我们。他在甘洲〔州〕福音堂开医院，帮我们收容了一部分同志。因他过于热忱，引起马家的仇视，因〔于〕正月三

* 此件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谢觉哉、伍修权在兰州致洛甫的电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号他被秘密枪决。我即要同朱绍良长官谈此问题，结果再告。

(三) 此地民族问题很严重，额济纳的图王被中央的专员赶到西宁，现在中央又以一旅人，武力解除阿拉善达王全部的武装，青马是一意孤行，而宁马模棱得很，这是此地少数民族□□的现象，而我们的工作基础又太弱了，虽说我想再去做。

(四) 近来兰州有点紧张空气，一方面有《战号》、《西北青年》刊物出现和座谈会的发展，但蓝衣社是在动员全力，应付某人，参加救亡工作积极的或与我们关系密切者，就受到监视和多方的清查，甚至在此演《放下你的鞭子》，省教育厅长郭〔葛〕武燊质问主事人：“难道你们没有考虑这戏的内容吗？”主事人答：“听说在全国都在演。”

(五) 关于救亡运动，政训主任董某是抗日后援会〔主任〕，要求此人，问他有多少会员？他答复：是同国民党昏聩统治下的全民都是会员。有人同教育厅长太太谈话时，提出女子均都要来参加救亡工作？答复是纯洁女子当参加救亡工作，是好的，不怕有党派作鬼，如共产党来参加那就不好。省党部的密令，令各县严防共党活动，省府传出杨杰有来甘主政说。

谢、伍

三月三日

谢觉哉同志一九三八年三月 给林老的信*

林老：

(一) 近来此地救亡工作比较有些恶化，蓝衣利用他们各方面统治的地位，合并各抗战团体、实际上是合并和取消比较进步的抗战团体。此地在群众中稍有基础的青年抗战团，现与蓝衣社所统治的抗敌后援会相对峙〔峙〕。因为各存极端的私见，所以我们进行了某些合并运动，也全无结果。在战区司令部下，组织了书报审查委员会。三个进步书店，即是新生书店、生活书店、兰州书报社等，暂停营业，全部的书籍都在被审查中。此后某些进步书籍，停止出售，自是预料中的前途。四月四日的儿童节，朱绍良本同意联合举行。可是教〔育〕厅长郭〔葛〕武槩（系蓝衣负责人），反对联合举行，并令各学校不参加此事，现仍在交涉中。不管结果如何，由此可见蓝衣的气焰了。各学校进行所谓的战时训练，经常进行内务检查。在许多的学校内，禁止着生活书店的出版物。

(二) 加伦这次带来的二十余人……，此地警厅十分注意，曾派人来公开调查，便衣是经常在门前游荡，监视

* 此件是谢觉哉同志写给林伯渠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他们。估计这些人是分散做秘密工作的。总之，现在之当局，是比以前注意我们多了。也可说在当局方面，反对我们的空气，是有相当浓厚。战区司令部，又故意造出谣言，要取消我们办事处。……

(三) (略)

(四) 由新疆送来了二十五辆自行车，没有来信。这里雇车太贵，最好有自己的车来时带回去。万一不能，我们再由此地找车送来。

(五) 我们早已得到信，听说有拾辆轻机关枪和子弹来。可是问过阿克莫夫数次，据说这些东西至今尚未到。

(六)、(七) (略)

(八) 传被公安局秘密捕去者有十一人。

镇海原回民暴动、 我主和解并分界管辖

毛、洛、陈：

甲、镇〔海〕原回民暴动事，朱对□学生训话时，暗示此事有共党背景。目〔日〕前苏联邦代表见朱，探询海原情形。□问此事系汉奸托派或某方人士指示？朱答：□□□仅报以微笑而已。

乙、朱派其金参议两度找我，表明合水情形。表示部下绝对不准乱动，齐〔金〕询我们意见。答称：我方绝对保持和平，合水的群众工作，完全合于政府法令，即三民主义原则。那是〔些〕摧残民众运动的分子，我们是反对的。金称：朱之左右三分之二，对合水之主派〔张〕，顾全大局，和解。而三分之一则主蛮干。金并提出，双方派人实地分界管辖。我方对此事如何？请示知。

修 权

（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伍修权一九三九年六月 七日致洛甫同志电*

洛甫同志：

甲、最近联络尚好，发给我们的报是否全部到，则不知。

乙、书籍五大车已于六号由兰州送西安，不懂中国话的王同志亦同此车来。

丙、马洪〔鸿〕宾同马国贞来我处面谈一次，我们劝他们应放弃目前反政府的态度，为求达民族解放，须从远大处着想，应有正确原则及行动方针，与他〔们〕建议结束这次回变，于中派些优秀分子到陕北受训，当时马国贞已同意我们的意见，以后情形待告。

丁、虞日地方报载甘肃省府秘书长丁宜中已由行〔政〕院会议免职，新秘书长为〔翁〕燕翼。

戊、康生同志派来此地住之李同志月内即可回延。

己、中、韩十三同志昨日去西安七名，余六名明后日即回去西安转延。

修 权

七 日

* 此件是伍修权在兰州致洛甫同志的电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兰州办事处工作报告*

(一九四一年七月)

一、兰州各方面情况

甲、三年来甘肃省政府的三次改组——一九三八年年初，当我到甘肃的时候，正当朱绍良接替贺耀祖的省主席职，当时省府各主脑如下：

秘书长丁宜中，为国民党内较有正义感人士。其妻为肖军老婆的姐姐王德谦，因这件婚事，丁宜中被认为共党嫌疑犯而撤职。民厅长罗贡华，过去曾参加闽变，后参加复兴社，在任时一意专行，不听朱绍良指挥，故与朱不和。教育厅长葛武棨，甘肃复兴社负责人，因不听朱绍良调度，亦与朱不睦。建厅长陈体诚属复兴社，但在小组织内地位不高，以做官发财为主。财厅长梁敬醇，国民党员，未参加小组织，系一旧式官僚。在此情况下，省府实际上被复兴社所占据，各处排挤C·C分子，这样引起C·C派大为不满。同时，因为这些复兴分子不听朱绍良的调度，朱对他们也很不满。一九三八年秋，C·C派鼓动朱绍良赴武汉见蒋。据说当朱见蒋时，表示自己愿辞职，否

* 此件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伍修权同志回到延安后，写给中央的报告。

则一定要换掉罗贡华、葛武燊。陈立夫此时便乘机活动，结果两位C·C分子代替复兴社。施奎龄被任民厅长，郑通和被任教厅长。C·C复兴的斗争，暂告结束。朱绍良之亲信翁燕翼，亦于此时被任省委兼秘书长。在一九四〇年秋，反共浪潮逐渐高涨，他们很害怕西北各种进步力量的汇合，威胁他们，故觉首先有强化省政府组织的必要。去年秋，知名的刽子手谷正伦被任为甘省主席，各厅处亦全部更动。王漱方为秘书长，谷的同乡，他是中央委员，C·C中的要角。郑振宇为民厅长，是第一届全国参政员，谷的亲信。他到甘后，即大事反共，在各种集会场合中，说共产党是好党敌军，说中央有充分把握，三分军事反共，七分抗日。教厅长仍是郑通和，没有变更。财厅长陈国梁原为鹿钟麟的财厅长，调任甘财厅长，恐怕是借用他的反共经验吧！建厅长张心一，甘肃人，为黄炎培的女婿，留美生，学农业的。

总之，甘省府的这几次改组，在工作能力上是一次比一次加强，同时也是一次比一次反动。

乙、甘肃省党部在这三年内没有基本的变更。过去甘肃是属于第三级的省党部，去秋已改为第一级的省党部，有委员十一人。主要〔委〕朱绍良。委员兼书记长赵清正，为前中组部张励生的亲信。委员有寻天章，留德生，是朱家骅的亲信。杨集瀛，是地方绅士代表。胡维藩、李少陵是复兴社参加省〔党〕部的代表。朱贯三、段焯、韩达是中央党部直接派去的，其中以韩达最有能力，专负陇东方面的党务责任，其余委员不详。

丙、指挥西北军事的是第八战区的。其实，战区完全是个空架子。战区长官朱绍良。参谋长章亮琛，湖南湘乡人，保定生，毫无实权。参谋处长贾康，湖南益阳人，日本士官生。副处长拜伟，河南人，原属西北军。其余各处因无任何联系均不详。总之战区司令部完全是空架子，无所视事，内部人员可说多是安排的一些失意军人。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下面分宣传、组织、调查、总务四个组，均属上校组长。政治部根本没有做政治工作，只是利用政工人员名义，定期派人到四马及绥傅的部队中去做特务调查工作。

甘肃有二十六补训处，处长是前二十四师师长李英，保定生，朱绍良任师长时，李英为该师团长。现补训处下有六个补分〔充〕团，分驻于兰州、定西、静宁、平凉、临洮、陇西、天水等地。每团按编制应为二千余人，实则每团不足一千五百余人。这些补充团从去年就说要编为一个新的军，但到现在还未实现。甘肃军区司令原为朱绍良，谷正伦主甘后，改为谷正伦，司令部内也换了一批谷正伦带去的人。

甘肃的兵力并不强大，只有一个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所属第四十八师师长罗烈，驻兰州、定西、临洮一带。预备七师驻静宁、隆德一带。一九一师及一军部驻平凉、固原、中卫之线。此外有绥西调回整理的骑兵十师，驻界石铺、隆德一带。原由一九一师派往二力子河的一个团，现则扩编为一个旅，番号记不清。

二、甘肃各种矛盾的错杂——除了国共两党在甘的基本矛盾以外，国民党内各种矛盾略述如下：

甲、复兴社与C·C的矛盾。一九三八年时，复兴社的人不仅把持了军队和政府，同时他们向党部进攻，想把党部也弄到手。此时C·C分子大起恐慌，这时党部对办事处、对进步分子都表示好感，攻击复兴派。待C·C分子在省府找到了两个厅长的位置，省党部巩固了的时候，他们同样反对一切进步的活动。由那时起，C·C派在甘肃的势力是日益增强，日益反动。

乙、朱绍良与各方的矛盾。朱绍良也可说是国民党中的元老派，为人态度尚温和理智，办事也还认真，复兴社和C·C派对他虽没有特别好感，但他还能控制这两个派别，不致过火的胡作非为，如在一九三九年冬，陇东冲突时，C·C及复兴均表示要大干一下，但我见朱绍良时及侧面所听到的，他都表示以不使事态扩大为原则。C·C曾向朱提出撤销我们办事处，朱绍良表示不是时机。复兴的两个厅长是朱赶走的，因此两派在表面上对朱尊敬，实则对朱都不表示好感。

朱绍良辞省主席职是迫不得已，谷正伦接事后，大批撤换朱绍良的人，朱绍良对此很不满。朱则利用战区权力，各方阻挠省府工作的进行。谷正伦曾派人警告朱绍良的大女儿，令其停止煤砖的屯积居奇，可见他们间矛盾的利害。

朱绍良是个光杆，他总想建立一点自己的实力，因此他极力袒护二十六补训处处长李英。因为李英既不是黄埔生，且是朱绍良以前的部下。所以朱极力想把补训处的几

个补充团向中央建议编为一个军，并保李英为军长，以造成他的实力。去秋以来，进行特别起劲，后为胡宗南所查知，建议将李英撤换。我离兰时，中央已有撤换李英的电令，朱对此事曾痛骂胡宗南。

丙、中央系与地方系的矛盾。地方的军事实力，以鲁大昌、邓宝珊为代表。一九三八年鲁大昌的一六五师，由胡宗南派周凤岐为师长，负责整编，鲁大昌则升任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去年军部取消，鲁大昌升任为东路指挥，并被任为甘肃全省禁烟督导团的团长，实则光杆一名。

邓宝珊赴榆林后，留李贵清旅驻于定西、靖远，此旅之杜汉三团，则为邓宝珊的一点基干。杜汉三本人较进步，他的两个女儿现均在延。一九三八年夏，他找了几个抗大生，到他部队去做政治文化工作。同年秋，他的女儿也想到他的部队去做工作，此事早为战区所知，后来朱绍良利用调他赴兰公干的机会（调虎离山）撤了他的职。后来经邓宝珊的交涉，决〔定〕调这个团赴榆林，可是胡宗南部〔怕〕这个团道经延安时赤化，终于把这个团留下了。在整训的名义下，这个团已完全解体。

地方势力（士绅）一向是借用中央大员的力量，找些税局长、县长做，可是抗战几年来都被外省人所代替了，并且由于县长的不断更调，大家都抱着总是干不长的，刮一个是一个为目的。在省一级的各机关内重要位置为外省人所占据，本省人只有做小职员资格，这些现象使地方绅士及知识层对中央系均表不满。地方士绅如省参议会议长张维（鸿汀）多少代表了一些老百姓的意见讲了一些

活。大概是去年九月间，在谷正伦的就职典礼上，张维提出两个问题，一、老百姓并不反对兵役，可是如果将近一半的壮丁，在受训的期间，因为饥寒和病而死去，老百姓都十分寒心而不愿当兵。去冬有一个补充团，由平凉开兰州路上，冻死了四、五百人，连逃出在内约减去了五分之一。最奇怪的当官的觉得死了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人死了，可以将旧衣剥下，有所报销。如果逃亡了，就不好向上呈报了。二、粮价飞涨，许多人无饭吃，如不平抑粮价，来年青黄不接时，民食将大成问题，匪患将随之发展，此两点盼政府早早注意。

地方士绅可分为三派：一派是附和中央，自己找官做，……。另一派是对中央不满，但希望中央能接受他们一些意见，以稳定社会和他们的地位，这派人以张维为代表。最后是同情我们主张，不赞成国民党的做法而完全在野失意的士绅，其代表人物为慕少堂（我所知道的是大概，甘肃同志当更知其详）。

丁。由于征募壮丁，保甲长从中大发其财。征兵的重担，差不多完全落在穷人身上，穷人既要出钱，又要出力，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劳动〔力〕，就无法生活，结果形成乡村中的民不聊生。去年甘肃的收成不好，下半年粮价大涨，群众生活甚为困苦。

在上述的情况下，一部份地方失业军人回到家乡，没有出路。故甘肃各地，如兰州附近、陇南一带的土匪活动，是在不断发展。哥老会活动的发展与地方军人的失业、人民生活的困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甘肃的劳苦大

众、地方失业军人与一部分的士绅及知识层以及各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对现状普遍地表示不满。甘肃的客观条件，有利于我们党的工作发展，不过我们在甘肃党的组织力量过于薄弱。

三、马家动态。

去秋白崇禧到过甘宁青，见过四马，目的是在争取马家归附中央，马鸿逵亦曾随白赴渝，一时在兰州盛传胡宗南将为宁夏主席，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完成了对边区三面的封锁，另一方面撤〔拆〕散了四马在西北的团结。如此，既可便于进攻边区，亦便于分化马家，中央天下便可在西北巩固起来。谁知马鸿逵回宁后，坚不辞主席职，四马间有更密切的联络。马步青、马步芳对中央的态度，也逐渐强硬。战区政治部派往骑五军任政治部主任的皮亚元，于去冬被驱逐。马步芳对于中央派往青海作特务工作性质的人员，一概加以驱逐。据我三年来所观察听到的，中央在四马中的影响，并未加强，相反地是日益削弱。中央一向是想利用怀柔政策收买分化四马，四马一向是想用倾向中央的姿态，在经济上接济上占些便宜。到现〔在〕各人的心事是“心照不宣”了。据公认，四马的首领是马步芳。据较确切的判断，马步芳约有军队四万余人，马步青的骑五军不到两万人，马鸿逵约有四万人，马鸿宾的队伍，只有万余人。总之，四马力量的总和是十万人，而不可估计太大。四马当然是反共的，更正确些说他们是十分害怕我们复仇，他们反共是防守的，而不是进攻的。如果我们以宽大为怀，确实不记前嫌，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的

可能是存在的。

四、西北的文化运动。

一句话是江河日下。一九三八年初，曾有一时的活跃，当时有好几个剧团，如血花剧团，家庭小剧团，平津剧团，新安旅行团等的活动。出版有《战号》、《民众通讯》、《甘肃青年》等小刊物。塞克、肖军等也曾去过甘肃碰钉子。结果各进步团体便被解散驱逐，刊物封闭停刊，文化人被驱逐，到我离开兰州时，不仅见不到我们的刊物，连文摘也见不到一份，而反共的书籍刊物，到处皆是。

五、我们所做的工作。

甲、我们同各方面的联系。我们同省政府、省党部及战区，一向保持相当好的关系，如去春新兵营归队，去秋三十几个同志回来，来去新疆办护照等事，他们尚不与我们特别为难。我离兰前向战区要护照，结果五天发下来了，路上没有特别为难。总之，兰州是比西安的环境要好些，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威胁他们的事。其次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也是十分检点的。

省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省党部、战区等机关，都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同我们来往，在一九三九年冬陇东冲突以后，这些进步分子有的被撤职，有的调动，以后便没有什么人敢同我们来往。谷正伦到甘后，情形更坏，除了一次普通拜会外，便没有任何来往了。

当我们同一部分进步人士保持着联系时，我们可以将党的各种主张经过他们传播社会，三八、三九年时新华报

上各领导同志的文章，还能贴在街头的墙上，看的人极多，以后就不行。不过直至我离兰时，所有党的主张还能经过少数进步分子传播出去。

我们同俄国同志的来往是公开的，这是在各种宴会中形成的，政府各种宴会请我也请许多俄国人。俄国同志设宴时，请各机关负责人，也请我。我们便被双方认为合法的，所以，我也就整齐服装，时往苏联代表处拜会，至离兰时，还未遇到意外阻挠。去夏以来，朱绍良曾召集各机关首脑会议，通知一切机关不经外交手续，不得同苏联机关联络，因未正式通知我们，也就不理他们这一套。

乙、内部做的工作，①在三八、三九年还陆续收容了少数干部和战士，有一个团政委，一个营长，连排长若干，战士数十名；②三九年秋由马步青放出百余残废，我们曾协助他们向战区找到了一部分路费回家；③对于运送西面来往人员，除郑德等同志被扣外，未发生别〔的〕岔子。郑德等同志的被扣，主要是国民党有计划的行动，其次是东西太多，应付不周和没有副官带路。不过当时办事处简直没有人也是实在的情形；④帮苏联同志做了部分翻译工作和了解中国状况的工作。

丙、（略）

丁、办事处内会议、生活及学习。我们对党的生活及学习虽未做好，但时时总记着要注意党的生活及学习，过去是寒热病的在进行，去年十月便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每周开会一次，这次党的会，下次就开行政会，如此循环。当我们还能收到新华报时，每日一次读报，一次政治课

(中革运史)，一次习字，后来报纸收不到改学地理，我每周教他们一次国际常识或时事问题。有三个同志，每天教一课俄文，我临走时，李培华同志已经学到一点基础，并有若干自修的能力。我自己借江同志的机会，学了两个月的法文，心绪不好，没有成绩。

六、(略)

七、可以利用的几个关系。

①张效良，现为八战区经济委员，安徽人，四十余岁，他说以前是党员，曾在二五年坐监，出狱后失关系。在武汉开始与董老联络，我们同他保持友好关系。我同他接触有两年，他曾要求参加组织，未得中组部批准。后来，他表示只希望不同我们失去联系就好。他现住兰州新关街二〇七号内后院，我离兰前半月同他见面时，他肯定的表示，如有个别同志去，他可代找职业，但以文化较高，学经济学的为适宜，如果是安徽人就更好了，我以为这个关系可利用。去的人第一步是研究他本人的表现，如确忠实于我党，则很能掩护工作的开展，如其不可靠也绝不会危害这个别的同志。

②樊景润，湖北黄冈人，约四十岁，他说知道潭秋的情形。大革命时，曾参加党，南昌暴动时因病落伍失关系。因他懂德文，经友人介绍得在陈铭枢下任翻译工作，后得陈助留德学飞机工程，回国后在欧亚公司工作。我到兰州，他到兰州欧亚公司任技师。我同他接触三年，觉得对我党确有诚意，于去年得组织部批准，允许他加入组织为特别党员。可是地方党怕这个关系，自去年十二月

至今没有同他联络。如早派个政治坚定的同志去，一定可以找到工作掩护，可考察他，可以于日后发展组织，如果找湖北人去则更好，我同他约有联络关系。

③李干球，湖南湘乡〔人〕，四十余，也是大革命后失关系的，是西安介绍到我处的，他现在兰州第二十六补训处任中校医务主任。在我离兰前，他负责对我说，在他的医务室，可找到个别同志的工作以做掩护，现仍与留守的副官有联络。

④邓宝珊的基干团团长杜汉三，因思想左倾撤职，这几年他确有很大的进步，见到了我们的刊物则如获至宝，如新民主主义等材料。他是天水人，保定生，资格很老，以前新疆金树仁的参谋长。陈启修与他常有往来，他们是保定同学，陈受杜的影响，这三年来思想也在左转，经过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支配大部甘肃省的失业军人。他们同鲁大昌拉得很紧，因鲁大昌对中央也很不满，杜现住兰州南郊段家庄二号，他的连长王新潮现同办事处有联络。

⑤钟一杰，他同徐培根、黄炎培等都是至交，抗战前在南京为我党做情报工作。他到兰州后，经中央转潘汉年的电报要我们同他联络，开始是同我联络，后来地方党几个同志同他联络，大家对他的影响都好。但他从未要求参加组织，他可以帮我们做部分的情报工作，但不能掩护我们的人，如果同他闹得好，这种可能是有的。

就拿这几段关系来说，地方党过去没有适当的同志来利用这些关系，如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的话，现在派个别同志去，为时尚不迟。

.....

八、所谓的几点工作意见。

本来找不出什么工作经验来，现勉为其力的写下几点来。

甲、总的说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在一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上，正确待人接物问题。当我读到了洛甫同志那篇文章后，对我这三年多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帮助，使那些虽然很少的对内对外的的工作，总算是没有大岔子，应付过去了。如果照我过去的个性做，那恐怕发生的问题就多了。

乙、并不是拜会一个高级长官或正式谈判一个问题，才算是统一战线工作，而凡是我們同任何友党友军人员的接触，都是一部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方面说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人员（下级同志）普遍应付的常识较差，不是把自己一套政治主张搬出来，就是没有话讲，不会在便谈中相机发表意见。相反的，人家在便谈中却可以了解我们的情形。学习应付统一战线中较复杂的环境，应引起我们一般下级同志的注意。因为在坚持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一般同志都随时有同友党友军及一般人士接触的机会。提高一般同志的常识，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生活习惯是必要的。

丙、在任何统一战线工作中，首先应尊重他人的意见（即或他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人家对我意见的尊重和信仰，以致放弃他自己不妥当等意见。

丁、做事要有耐心。一个理论的问题，说服人家要有

耐心。交涉一件事十天半月也要忍耐，否则你燥急，人家愈拖延，结果愈不能得手。例如我们这次由西安回延安交涉车的事，费了一个月的手续才成功，但是我们成功了。

戊、外面很注重尊重长者。在军队中很注意上下级关系。在外面我们对长者要尊敬，对长官也要表示谨慎，对友军的下级则表示诚恳。

己、在外面有数不清人面兽心、口是心非的人，我们也要学一套，而至真至诚的在谈着一套，心里是打算着另外的算盘，这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应付大批坏蛋的必须具备的本领，否则，到处都可出岔子。

庚、只要那些坏分子还能保持自己相当的人格和尊严，而不是采取流氓的方式胡来，我们不应害怕同他接近，先自己把脚步站稳，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们总可由他们中找到些材料，我们自己呢，有的是党公开的主张，可以同他们大谈特谈。

辛、无数的敌探总是想经过办事处侦察党，我遇到了无数次这样情形，某人以进步分子出面，为着加入党，为着保持他的社会地位能于后来为党工作，他盼望能同地方同志联系，既不考察他并可避免暴露，我从侧面查知了好多这样的人是特务，这点特别值得提出，以兹注意。

九、今后各地办事处如果继续存在或开展，

我觉得办事处的组织应以精〔干〕灵活为原则。

拿兰州来说，我们从未超过十个人，即我、译电员、副官、采买、勤务员二、传令兵二、伙夫一。在这个范围内，我一贯的〔地〕向他们说，除了基本的分工外，但当

某些同志空了，旁的同志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就要帮着做。革命工作绝不是机械的分工，因此，办事处的人要精干，领导的同志要灵活的领导每一件工作。兰州现留下的赵芝瑞、李培华、周铁群三人都是在延受过训派去的，我认为应付目前环境算够精干了。

十、(略)

.....

伍 修 权

七月十五日

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

敦 夫

总理积四十年的经验，临终留给我们一个遗嘱，说这样做，中华民族就可以解放，在今天，就可以打胜日本，保卫中国，不这样做，那就打不赢日本，大家只好做亡国奴。

办法极清楚而又容易。

第一，“唤起民众”。“唤”是民众还没有清醒，已清醒的党员，要去宣传他，扶植他。“起”是民众听到“唤”，一骨碌站起来，发展其奋斗的身手。字义很明白：“唤”是我们去“唤”，“起”是民众自己“起”。假如不去“唤”，或限制“唤”，如言论出版不能完全自由；“起”也不任自由“起”，如集会结社受到限制，那都是误解了总理的遗嘱。总理曾经这样做：出报纸，设政治讲习所，农运讲习所做“唤”的机关和训练“唤”的人才，扶植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党纲上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以为“起”的地步，在今天，就是应该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是唤〕

集会结社〔是起〕的完全自由。

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平等待我，是说对我无野心，不想占我的便宜。这样的民族，虽然不止一个，但有的自己还是被压迫者，没有资格能平等待我，真能平等待我的，只有苏联。事实上苏联一开始就自动宣布取消帝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退还赔款，大革命时苏联无条件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一直到今天，苏联始终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总理临终时写给苏联的信，说“我为命运所限，不得不放下我的事业，但我已命令国民党员继续与你们手携手的前进。”我们党员是接受了这命令的。当然，不是说其他虽不全以平等待我而能帮助或中立于我们对日抗战者不去联合。朋友是越多越好。不过朋友而兄弟的，更要着重联合罢了。

第三，开国民会议，在宪政未实行时，不能产生全国人民选举的国会，而又急切需要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决定救国大计。总理主张召集的国民会议，就是为此。十三年，总理抱病北上，和段祺瑞力争不得，临终把这件事写在遗嘱上，说“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当时，总理坚持着不肯让步的，有两个条件，（一）是一切人民团体，只要他有群众（不是空招牌），并是革命的，都有选派代表的资格，不管他合法与否。（二）是开会前应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尽量的讨论救国大计。缺乏这两条件，其会议必成为御用，不讲有所成就，所以，总理宣布不参加段氏的善后会议。

这样的会议，在今天更其需要。

还有：“共同奋斗”，四字；包含总理极深长的经验，国内有不同的阶级和派别，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可是在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在今天即抗日救亡上，需要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向前奋斗，不允许有任何不诚意或私见掺杂其中，没有这，就会使民众解放工作，受到障碍。

总理是先知先觉，是民众救星，只有彻底执行总理遗嘱，才能保卫中国，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西北日报》第七版)

读贺主席入党训词

无 奇

贺主席对区长巡官入党训词，提出了党员□□□□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当此大难临头，□□□□不容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彻底了解□□□□贺主席的话，才能完成党给予我们□□□□。

第一，关于党员的反省与改进。区长巡官受训，为的救国，不是为的做官。贺主席说：“中国所谓读书人，以书为取得官位之捷径，——各位现出负一部分责任要于此点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做了官而起骄傲的心理，我们要使政治达到预期的进步，就要改除这种恶习。”本来入党与做官是两件事，入党是为达到党的主张而奋斗，党员做官，是经过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主张。不用讳饰的，有些人，做了官就忘掉党。国家弄到这地步，这些人应负若干责任。贺主席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所以特为指出。反省过去，改进将来，怎样改进呢？贺主席又说：“共产党员的努力，实在超过本党党员之上。比较起来，除党我们党员有努力取法以谋进步的必要。”当然不是说本党党员并不努力，而是说努力的程度与方式，我们应该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态度，使我们党员，集各党之长，担

负起目前抗日救亡的大任。

第二，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合作不是形式，而需要诚意，假如是表面的甚或还有点摩擦，那就不免减少合作效力，使民族革命受到损失。所以贺主席郑重说明：“在全国一致抗敌目标之下，共产党放弃其阶级斗争及暴动政策，来诚意合作，参加抗战，这是很好的现象。”共产党既诚意了，我们也应该诚意。贺主席又说：“互相策励，诚意合作，自可以收观摩之意。所以在此期间，不消说，共产党必须实践其对于我们的诺言，而我们对于共产党员亦不可有恶意的估量，分散抗敌的力量，应该在一致的主张及行动之下，共赴国难，绝对不要互相摩擦，致影响国家前途。这是说明对共党“恶意估量”的结果即是“分散抗敌力量”，国共如有“摩擦”就要“影响国家前途”。

其次，“共产党有很好的办法，我们乐于接受”，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好办法但好办法不厌其多，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组织与训练，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游击战、运动战，毫无疑问的有他的特长，应该虚心考察仿效，俾收观摩之益，不应该故步自封，阻其进步。我们对贺主席这一指示，宜有深刻的警惕〔悟〕。

贺主席是西北政与党的最高领袖，……我们同志依照他的指示，必然得到成功，也只有依照他的指示，才能得到成功。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西北日报》第七版）

“不良分子”的界说

明 远

最近田厅长召见甘肃青年抗战队负责人指示说：

“自家要认识目前一切，严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不良分子”与“汉奸”，固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在客观上“不良分子”常常是“汉奸”的帮手；所以严防。因为他与“汉奸”有差别，所以非有认识，不易严防。

吾人以为“不良分子”的界说，不外如下：

第一，目前是全民抗战，要广泛地组织与训练人民，充分发展人民的抗战力量。如有企图缩小并限制民运的，便是“不良分子”。

第二，蒋委员长说：“吾人无论何时，应任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凡过去有何嫌怨，甚至现在有何利害不同，都应该完全抛弃以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总利益，如有斤斤然于个人利益的，企图以私害公的，便是“不良分子”。

第三，吾人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孤存。对日抗战，乃艰苦的持久的抗战。现在的世界，很明显的划分为和平集团

与侵略集团，吾人在外交上必须加入和平集团反对侵略集团，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有假“自力更生”的美名，企图使中国孤立以便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便是“不良分子”。

第四，吾人须知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的死对头，吾人不欲亦无力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树敌太多。又吾人所反对者不是日本全体国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有故意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或主张中国之对日抗战，为对日本全体国民抗战的，便是“不良分子。”

第五，时至今日，唯有绝对信任政府，信任领袖。在统一的命令、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意志之下，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挽救中国的危亡。吾人应该绝对相信，政府所有的一切设施和准备，都是为抗日，非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和平谈判的途径。如有故意造谣惑众、企图动摇民众对于政府对于领袖之信仰，破坏抗敌“统一战线”的，便是“不良分子。”

第六，只有抗日的自由，没有汉奸的自由；只有革命的自由，没有反革命的自由。如有滥用自由，或企图限制正当而且合理之自由的，便是“不良分子”。

吾人对于“不良分子”的界说，作如是观。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北日报》第五版）

祝妇女旬刊的诞生

谢 觉 斋

日寇大举进攻，甘肃已经站在火线上了。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起来拚命；甘肃六百万人民中的三百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

旬刊编者问我要稿，我对妇女工作，了解太少。但是，我觉得：

号称“全民战”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假如没有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参加，不仅是个损失，而且战争的彻底胜利，将不可能。这是一。

第二，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层，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但一起来了，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实告诉我们：党国先进最坚守总理遗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庆龄、何香凝两女同志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许多事实，证明了女同胞的勇敢与能力。即据我个人所见到听到的，也可写上一大本。华北问题发生后，平津女学生的努力，比男学生还来得纯洁。一些文弱女生，为求得革命知识，居然草鞋包袱，偷关冒险，这不能不使人感动。

一些人，把女人抗战力量，估量过小，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妇女的境遇与心性，甚至连他自己即是对抗战没有决心的。

不过女子运动也和男子一样，须要有政治上的保障，即一切民主自由与生活改善。没有这，三百万的甘肃女同胞，不易把她们兴奋起来，组织起来，一同走上抗战大道。

我对甘肃妇运的领导者，旬刊主编人斐君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斐君女士的不畏难不避谤，使得无妇运的甘肃——妇女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并不后于男子，在她的努力之下，相信妇女干部，必然层出不穷，妇女组织必然深入普遍，三百万女同胞，将贡献其力量于抗战，而同时解放自己。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妇女旬刊》第一期）

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

谢 觉 斋

有位同志说：“一切改革，等战争过去再说罢，”意思是说人才财力既集中于战争，其他最好是维持常态，不要动。他以为战争象夏天的狂风暴雨一样，站在大树下躲一刻，雨过天晴，仍旧走我的路。他不知这次战争，胜呢，得到了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败呢，就沦为朝鲜印度同一命运，永远不易恢复。这是民族生死的历史关头，一切改革，正是为着在这历史关头站得住，不灭亡。

人们为什么有这样思想——等战争过去再说的思想？我想，是有社会根源的。第一，中国社会，历来下层民众与上层统治者打成两橛。上层争来夺去，只是把下层的血来沾污历史，于社会组织民族存亡没大关系。于是这时刻的士大夫，就有这样的一套法宝，叫做“上者避世，其次避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使天运已不可挽回，说不定新朝仍是要借重我们的。第二，中国是老大帝国，从没有亡过国，金人、元人、满人侵入中国，不是亡国，只算换帝改朝，老百姓不还是一样的吗。尽管朝鲜台湾甚至东北四省亡国惨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仍是茫然，脑子里仍是旧的观念。

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对战争消极，亡国不是很可怕的思想的根源。

必须克服这类思想，才能铺平抗战胜利的大道。在女同胞中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女同胞除要防止这类落后的传染外还有个传统的弱点：“国家大事，让男子去担当罢！”有些男子也大言不惭：“妇人家知道什么？少麻烦些罢！”于是妇人家就站在旁边，“等战争过去再说，”那真糟糕！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跑上前线，和一般爱国男儿一样，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战，打退快临到我们头上的亡国奴命运。

（原载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三期《妇女旬刊》）

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

觉 斋

“战争是社会进化最主要的动力”，百十年推动不够的，战争一起，好象换转了汽机，转眼就走得很远。这次抗日战争，一方面是不幸，一方面是很幸，比中国男子更沉沦的中国妇女，可以在战争过程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所以我们对战争用不着恐惧。

“民众运动与民众自己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这是做民运工作者应该知道的原则。几个月来的抗战经验，证明只挂民运招牌，只要求民众牺牲，不让民众解决自己的痛苦的办法，全无用处。同关在厨房里，挨丈夫阿姑打骂的女子，说上前线，同没有裤子穿的甘肃大姑娘说募捐慰劳，是没有人理你的。不过有一规律。一切民众生活的改善，就服从于抗战的总利益，就是说要发展妇女的抗战力量，必须解放妇女生活的束缚和痛苦，没有这，妇运将始终陷于空招牌，或只是在上层妇女中兜圈子，不能发生什么力量。

怎么做呢？首先要制出一个妇女抗战纲领内容：

(一) 妇女抗敌的任务，如制慰劳品，看护伤病兵，参

加生产，鼓励丈夫儿女上前线，乃至本身荷枪参加战斗。（在主义上讲，是民族主义部分）（二）妇女同男子一样只接受合理的负担以外，还有权利讨论并建议解放其特殊痛苦，如不缠足，要读书，有经济权，禁止男子阿姑打骂等。（民生主义部分）这一纲领，由省党部制定或省党部指导妇慰会制定，不要空洞，以适合西北妇女要求为宜。

有了纲领，够了吗？不够，没有人施行，仍是空的。全省中小女学生，是妇女中优秀分子，把她们训练好，提高她们抗日的知识与技术，及抗日的情绪，决心为女界服务的情绪。自然，这里牵及到女子教育的改革，贤母良妻主义，固然混蛋，同男子一样关在屋子里念公式抄笔记，也是糊涂。此外，没读书而很热忱有能力的女子，可随时开训练班，用口不用笔，这些分子的作用，常常在知识妇女之上。

有了纲领，有了干部，就得下乡工作，女子抗战团（慰劳会亦可）应一直组织到乡，除执行上级指示外，还得自己工作，弱的地方，派好干部去帮助。注意培养本地妇女。这样，妇女工作才不是空的。

当然，这一工作非常困难，甘肃“男运”，尚无从说起，何说“妇运”？但国难逼来，如不愿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牛马，男子固然奋起，女子也必然奋起，只有死了半截的人，才说人们文化落后，生成是做亡国奴的贱骨头，我们女同志是忍不住这沉闷的。

在抗战过程中，救民族，救自己。解放自己，只要我

们干，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妇女旬刊》第四期）

甘肃教育的商榷

战争是无情的，也是进化的。几个月的抗战，它暴露了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许多弱点，尤其是教育，以前不管深识之士怎样指斥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隔离，不管千百万青年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怎样反抗，而教育的最高当局是不为所动的。现在呢，而炮声一响，把这些“教育官僚”的顽固幌子，打个粉碎。

西北是落后的地方，不久以前的学校，还保持着不许教员说教本以外的话，教本是白话，教员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释。抗战开始，教育当局说西北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说教育改革，即是需要，也“等战争过去再说吧”！炮火真无情，这些呓语，很快成为过去。军委第六部十二月十二日电布的二十纲领的第十九条“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国防之需要”。朱一民主席也说：“二十七年的教育，决不能再是二十六年的教育。”

然而春节已过，快开学了。教育的新方案，还没人提出。学生们在寒假中自动做了些救亡工作，他们在实际经验中感到技能和知识的不够，更感到过去学校教育的无用，学校将给他一些什么，难道过去的那一套还行吗？

几个先决问题：

第一，学校与社会合一。目前即与抗战合一。本来教育是要人们怎样适应和改进现在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制度，一是抄袭东西各国的，食而不化，不管是否合乎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读书人超越社会的阶级的传统习气，没有破除。今之学校和昔之书院，课程变动了，性质还差不多；校门外与校门内的天地不同；教本、笔记本一出校门即为无用。这毛病，在抗战时表现最厉害。在平津某些教育家到西北找寻“教育的堪察加”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兰州学校移到陇南去，某些青年自陕北角落而来逃亡，曾引起教育当局的惊骇。青年是热烈地、毅然地把救亡责任放在肩上，他要前进，学校却叫他逃避；他要知道怎样抗敌，学校却教他“抗敌不忘读书”，把读书和抗战打成两橛，他们没法子，只好反抗、出走。这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的教育制度的最后破产。我们必须根本铲除这个观念，即：一、不可把抗战与读书对立，而要是“抗战即是读书”，“读书是为着抗战”。二、把部章和法令暂且搁下，中央提出“改善教育制度”，即是说现存教育制度有“彻底的不善”的地方，如仍藉口部章，掩盖其不肯改进，那即是对中央不忠实。三、不得只表面改革或枝节改革，暗中仍保持其社会“脱节”的作用。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合一。学的就是做的，做的是抗战，学的也应是抗战。从前有个墨翟老夫子，听说楚国大师鲁般要来攻宋。墨夫子跑去问鲁般：“我在宋，你敢来攻吗？你有本事攻，我有本事守。”鲁般知道胜不过他，想杀了他。墨夫子说：“要杀就杀，我已有三百个弟子，

学会了我的本事，在宋境上等着你。”我们教师要像墨夫子一样，把抗战本事传授把〔给〕青年，一切与抗战无关或暂时不急要的课目姑且搁下。这是一。其次，一面学一面做。书本上抗战的理论与知识，是由经验积蓄而来的。但是，不去实验，不会深刻认识；有别处的经验，不一定到处都实用。用认定抗战运动的本身，即是最好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应校内学习与校外活动并重。比如农民运动，校内讨论过了，就分配学生去做，做一个时期又回来研究。又如兵役人员训练班，要从现在的不良现象中研究出办法，同时拿这些办法去实施，看效果如何。现为青年归往的某一角落的教育，没什么诀，就是即学即做，从做中去学。有时不需要学校形式，时刻在做时刻在学，因此其教育能发生无限的力量。

第三，教师质的改进。社会急剧的变，教师也应急剧的进步。目下的教师，大都是旧教育制度下养成的，把过去教师传授给他的笔记，再传给第二代，现在已用不着。那些笔记里，没有抗战一项，所以教师同学生一样，要向现在去学，要从实际工作中去学。教师具备较高的根底，一晓百晓，也可说是在同一学的过程中，高级学生领导低级学生。这不是我看不起现在的教师。“学不厌、教不倦”的老先生尚在边教边学，何况我们。不前进的教师，必然受到淘汰，同时应吸收社会上有声望的前进的人士担任讲课或指导，一切派系主义、地方主义等落后观念要彻底扫除。

学校教育的内容：

第一，编制不要呆板。入校不是为取得资格，按资开级，而是为求得实用。应该不限年龄资格，招收有志青年开办政治训练班、民运训练班、救护训练班……等，授以必要知识，随学随做。大家该未忘记北伐成功，得力于民运，民运之所以成功，由于广东办了政治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特殊学校所致。这样的学校，省城及县城都应该办。这里应注意的：1、要真正训练出救亡知识与能力，不要像以前训练班一样，大家来一套“精神讲话”就完事。2、入这些训练班的学生，应按他的工作成绩，给以与原校同样的学分。

又，甘肃当局人士常说，“文化落后，没有人用，救亡工作抓不开”。但去〔年〕秋季始业，有八百多要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因额满见遗。这些人都应该吸收到训练班来，造成为救亡干部。”

第二，教材应适合于实际的抗战。无疑的今春各校开学，课目必须有些变更，什么政治常识、抗战讲话、游击战术等都会开上，但我们不要外表而要内容。比如学工程的，应知道怎样掘战壕、做工事、挖飞机洞，且亲身去做。学医的应注重伤科、救护、率领学生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讲政治，要对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社会上各种生活和组织情形，彻底了解，给以正确的分析和估计。讲战术，应合于各种战斗胜负的具体材料做研究的对象，平型关战斗、晋豫边区游击是怎样胜利的，上海各次战斗的优点缺点在哪里。讲兵役，要研究广西何以能动员三四百万兵不要强迫，甘肃何以卖兵卖到四五百元一名，原因在哪

里？讲民运，要知道民众的困苦及其意识，知道妨碍民运的政治机构的毛病在哪里，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救济？……这类教材，有的现在已有，有的还待我们搜集，在工作过程中去发见。可是没有这些，抗战的教育，仍是空的，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第三，学生参加救亡活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我们不要，进内地找“教育堪察加”的教授也没多大用。我们要实际去做。学生参加救亡活动，教员做他们指导。去年寒假学生有下乡宣传的组织，可惜学校没有具体教示他们及下乡后的联系。有人说，不是要他们宣传，而是要他们早些离开兰州，免得多事。假如是这样，那是绝大错误。要知道发动全甘肃民众起来抗战，保卫西北，学生是个关键。怎样把握关键，教室讲演是不够的，需要亲身去实验，教员与学生同样去实验。实际工作，比什么“上课”、“会考”重要得多。现在快开学了，不是把已在做救亡工作的学生，重新关到教室里，而是要各中小学生对集合的机会，更有组织、有计划去发展一切救亡运动。

（一）一般的社会教育：
（二）似乎西北教育界对教育的对象，尚限在学校里的学生，但这只是质上好的部分。若在量上说，今天抗战教育的对象，应是间接或直接应该参加救亡战斗的前方与后方的广大民众。蒋委员长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应负守土抗战之责。”那末，教员要适应战时，受教育的就应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而不应只在狭小的范围

里走圈子。

第一，广泛的组织民众——组织本身即是一种教育。人们从组织里知道合群的力量与纪律。要把一盘散沙变成石头，只有拿洋灰去把它粘起来。农民散漫观念极重，但大革命时的湘粤农民可以集合数十万来帮助北伐。什么原因呢？有了农民协会。他们认定农民协会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加入了组织，落后分子与进步分子接近，容易受到感化。集会结社自由，是党的抗战重要条件，而教育者透过这些组织去进行教育，更为事半功倍。

比如青年抗战团，应经常训练他的团员，选定教材，分组讨论，同时这些讨论，必然的与抗战团的救国结（集）会相结合，不是说空话，使团员感不到兴趣。团员的能力知识逐渐提高，非团员的青年就会加入或者跟着走。目前，很多群众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有些组织仅有招牌，仅〔连〕会员名册都找不到，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里应特别声明一句：战时教育与民众运动，是分不开的。讲战时教育而不赞成开放或不参加民运的教育家都不知战时教育是什么。

第二，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省城不易买到新书报的，怕以兰州为最。仅有的两大报，因受种种限制，不能畅所欲言，不易反映社会的实况。其他很小的出版物，尚未脱离统制现象。甘肃所以没有战时气象，这不为无因罢。今后应根本改正，除汉奸外，一切抗日的言论，都应保障其自由。

第三，戏剧与歌咏。谁都知道戏剧与歌咏的感人深，

特别是不识字的民众，他们不能接受书本上的教育，但耳目是聪明的，情感是热烈的，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永世不忘，可以把他的的人生观改变。兰州最近才有话剧，王家兄妹的“放下你的鞭子”，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当然不够得很。今后应多组剧团、歌咏队，发挥青年天才，聘请名人指导。做救亡宣传的同志，在农村中，在军队里，在庙会中，讲演之后能够教群众唱几句歌，或者来一话剧，那岂不好吗？

第三，小先生制。——到农村里、工厂里、军队里、街道上去教人认字、讲道理，大先生不肯去，且不能遍去。于是，小先生制发明了。平、津、沪、汉均有小先生，尤其是广西有全省小先生联合会。十多岁的男女学生都在各种临时学校、夜校、露天校里当老师，他们有系统的教材，能相互研究教法，同时他们都能教救亡歌曲与游戏，他们的热心，很得到群众爱护。

以上略举几种对大众战时（教育）的方法，看当地的具体条件，还可研究出很多方法来。

（选自《谢觉哉手稿》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

甘肃省政府为着抗战，早就注意到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大批的训练区长、巡长人员；严惩贪污敲诈的命令；派员到各县考察。然而其效果如何？下层吏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怪象百出。

赵清正先生自靖远回来说：自护路队下乡代替县署原有筑路会，人民简直不得了，故意歪曲路线，说某屋子要拆，某坟墓要迁，以敲诈人民的钱。一七十余老人报告：护路队要拆他屋，出了二十多元才免。过几天把老人吊打一顿，说他破坏名誉，说护路队要了钱，勒令具张并无需索的结状。老人不怨出钱，只怨吊打。愤急了，才来喊冤。当调护路队组长对质，组长承认吊打不承认得钱，然而事实已经明显，该组长愿把钱退出。这是一。其次，老百姓愿意修路，可是人来了，监工老爷没到，不准动工；老爷走了，也不准动，一天截去早晚两段。又路面要铲平，铲平了，又要弓背。农民耕作要紧，想早些把路修好而不可得。

杨集瀛先生说：征兵全是买兵，壮丁愿去的不要，要钱。富人因和区乡长接近，可以不出或少出，贫人则非出不可。收了钱雇丁应征，区乡长当中可大发其财。陇南方面已发现人贩子。天水六十元可雇一丁，秦安则要一百二十元。从天水贩人到秦安出售，可得一倍利息。被卖的人中途逃回，可再度出卖。人逃了须补雇，又要摊钱，区乡长可再度发财。

杨先生又说：农民种大烟，十亩烟田，征税六十元，下种时缴一半。农民那时没有钱，于是有“撒账”的人来了，借给他三十元。收成好，十亩烟田收烟三百两，值洋三百元。“撒账”的人来收账，连本带利最低要一百一十元，又缴去半税三十元，剩下来农民所得的仅六十元。农民穷到这样，只好卖儿女，男孩价比女孩贱，男孩一岁五角，女孩一岁一元。

赵、杨先生是党部负责人，说的当然可靠。至于外传征来壮丁，穿的衣被剥了，带的钱被搜，有些冻饿死了。河西某招待站，吃了老百姓几十只羊、十多只牛不给钱。某些地方的居民快要逃光，某些地方的人民挺而走险，啸集山林，那多得很。当然也无法否认其不是事实。

二

为什么下层政治机构，经过三令五申而依然这样堕落呢？我以为不是不能整顿，而是所取的整顿方针，容有未

善。

第一，谁都知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勾结一气，在上级政府与广大民众中间，筑成一道坚墙，上有善政，经过这道坚墙就变了质，甚至变成相反的质。怎样才能摧毁这道坚墙呢？应该是上级法令的威严和下层民众的力量，两面夹攻，使他来不及招架。总理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又说：“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这就是“夹攻”的战术。事实上广西政治所以较为清明，且下山西政治渐上轨道，无不是对政治障碍采用“夹攻”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办法尚不免忽视民权，不信任民众的力量，甚或惧怕民众。因此，不欲“努力于赞助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使能监督区乡政治机构，逐渐使区乡政治机构变为民众组织的基础。相反的，区乡政治机构和民众对立（即统治）的观点，一点不变，而欲以“选择好官”、“好官去裁制劣绅”的方法，达到某种限度的改良。然而包龙图世间少有，而“做官”为的是“发财”，以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做官秘诀，探中人心，这道贪污土劣筑成的坚墙，并没因此发生破绽，反而趁国家抗战多事而猖獗起来。

第二，改革政治，须有改革的纲领。纲领的原则是三民主义，是军委第六部的二十条以及蒋委员长迭次训话。然而怎样才能把这些原则在西北实现，那就要根据西北实际情形，定出更具体的办法。比如西北高利贷是陕北的

应规定不得超过若干，违此处罚。摊派也是骇人的，应规定摊派须由人民开会决定，违法的准任何人告发。西北民众是没组织的，规定怎样扶植民运？西北教育是落后的，规定怎样推进战时教育？（当然不是更换几个校长的事。）边疆少数民族是复杂的，应规定一些怎样才使民族平等的纲领（不是拉拢上层就够的）……在制定这些纲领时，虽然不能开什么代表大会，但必须听取各团体的意见，各先进分子的意见，参酌各方考察所得的实际材料，以求纲领的尽善，且可能见之施行。

第三，政治刷新，要有了刷新的纲领，尤其要有能执行纲领的人。白健生先生说得好：“社会上的老年人，多半是土劣，至少是富于保守的，同这些人谈改革，等于对牛弹琴。必须训练青年担任县区乡工作。有人说青年没有经验不能办事，不知一次做事没经验，第二次就有经验了。广西是这样干的，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自然，推翻土劣，土劣是要挣扎的，但土劣始终是土劣，禁不起上面一纸文书的“镇压”。总理十三年改组党的时候，吸收大批积极青年入党，尤其是青年学生，党的工作，遂如日中天。但，西北似乎一切还把持在顽固人物手里，拿省城讲吧！几个委员会、训练班，总是那些人兜圈子，不能拉进新的成份。下层组织没建立，上层乃恰如沙漠上的宝塔。青年没有事做，没有满足他要求的教育，有的向某一角落里跑，有的消沉了，跑下乡去避敌机。抗战半年了，敌人已向宁夏威胁，而兰州市面仍如往时。县长区长人选仍是往时一套；黄缘哪，资格哪，外面带来的哪，总之，

并没做到“为事择人”。我想，应该照白先生说的：立刻办一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一样的政训班，招收青年学生，给以几个月前进的训练（象空洞的“精神训话”是用不着），派去负担下层政治机构工作，是最扼要不过的办法。

三

介绍几个具体例子。

关于民众组织的：

军委第六部布告的纲领第八条：“健全保甲组织，以树立民众组织之基础，以求民主政治之实现。”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怎样才能实现？李宗仁在五战区约法七章第五条：“在不违反抗日救国原则下，人民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之自由，政府不得妄加干涉。”山西总动员委员会纲领“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基本权利，没有这个，谈不到组织与动员。

至于要使保甲成为民众组织的基础，须使保甲为民众所有而后可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拟的抗战后方农村工作方案第四条说：“（一）区长、保长、甲长，须由农民直接选出，以防止贪污发生。（二）提高甲长会议职权，使甲长会议成为村政最高机关，俾中央一切命令有效实施而免上下隔膜。”山西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其职权为执行战时动员一切工作，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省级动

员会有省政府代表、战地军队代表、民众团体代表。县区级动委会有县政府区公所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应有民众选举之过半数代表参加。把党政军民集合在一起，意见汇合了，磨擦消除了，而以民意为依据，所以其动员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改善民生的：

一、惩贪污。军委六部纲领第十条：“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李宗仁约法七章第二条“公务人员有贪污、受贿、循私舞弊，一经查实，军法处置”。

二、实行合理负担。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六条“派粮捐款，须向殷实富户摊派，不得向自耕农及佃农强征。”第七条“本战区征用民力，须酌给伙食并禁止拉夫”。山西战地总动委会，以有钱出钱大家拚命为原则（有钱有力的出了钱也要出力），减租减息，免除过去的一切摊派，剔除中饱。本来中国人民有很大负担力量的，因为负担不合理，有钱出钱的口号，变成有钱的不出钱，没有钱的出钱，人民怨气冲天。钱也筹不到。

三、安定人民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提的方案中有：（一）切实办理二五减租和保障永佃权。（二）将汉奸不在土地和公有土地，免租分给农民耕种。（三）切实执行全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规定。（四）改进税捐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救济灾荒，组织难民从事屯垦工作。（六）保障抗战士兵家属生活，并免除其一切摊派。（七）改善军需供应之机构，禁止一切直接征发，征发民物应以给价为原则。这些都是党部决议或中央

法令已规定的了，某些地方已在充分执行。

关于武装民众的：

民众的仇敌（贪污土劣）去了，民生相当改善了，抗敌情绪自然高涨。军委第六部纲领第六条：“加紧壮丁训练，充实民众武力。”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四条“禁止擅征民枪，以自卫为原则，速由县府编队训练增厚地方自卫力量。”最值得效法的还是山西的人民自卫军，所有壮丁都参加自卫军受到半军事训练，由这中间而产生游击队，产生正规军，换句话说，强大的正规军，是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自卫军生长起来的，不仅比召募制强，也比征兵制强。以上举的，不过一端，但真的要动员民众，保卫西北，定要根据这些原则去做，才有可能。

四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件事：

从杨先生口里发现“借三十元钱，经过几个月，连本带利最低为二百一十元”。百分之七十的利息，还是“最低”！记得大清律上：“年久月深对本相还。”不管契约上利率怎样，欠的年岁好久，利息总只能与本相等。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决定利率不能超过全年百分之二十。为什么西北这样混胀的高利贷者，社会也不惊奇，政府也不取缔？有人说：“取缔”怕引起“阶级斗争”。只允许放帐的阶级向欠帐的阶级贪酷的斗，却不允

许替欠帐阶级说话。老虎在食羊，羊不能反抗，旁人也不肯去救护羊，说怕引起阶级斗争，岂不是大笑话。我以为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事，而是说这话的人，太固执他以自己为本位的阶级斗争了。

（选自《谢觉哉手稿》一九三八年二月）

有苦说不出

忠 理

打烂了屁股，还要提着裤子磕头，口称“谢大老爷恩典”，奉旨正法，要向北阙三跪九叩首才引颈就刑。这是中国传统的统治哲学。现在，这些形式没有了，但老百姓吃了冤枉，不敢说，也生怕别人代说，虽然冤枉了，怕一说出来，更有不测之祸。这现象，还普遍存在着。所以下面尽管乌烟瘴气，上面仍似乎可以歌颂升平。控告呢？本人固然不敢；报纸登载，更没有那冒失的记者。

也曾有官厅允许告密，说你有冤尽管说，本长官定替你保守秘密。可是“官官相护”，谁也不敢轻信。即会当真把对方办了，而对方知道是他告的反转来又向他出气。小百姓来一计算，只好拿出“忍”字来，打脱牙向肚里咽了。

这类事，甘肃似乎很多。要挽救，只有：

一、大打告发之门，有奸必摘，有罪必诛。

二、扶植民主运动，给民众团体监察一切犯罪者之权。

虽然“反民主论”者对此不免骇怪，然这是起码的民权主义，也是开发民众抗战运动的起码的工夫。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热血》四五期合刊）

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

金

人是能思维的。他能运用过去的经验做今后行动的指导：如旅行沙漠的人，望见天边变色，知道狂风会来，忙抓住骆驼肚毛躲在下面；小孩子被火烫了，即不敢再去拿火。

可是这简单的真理，一到了较复杂的行动里，常常被人忽视或忘记。前面的车覆了，后面的车还是开足马力冲去；敌人的刀明晃晃在眼前闪着，我们却装做看不见。

王家兄妹在民众教育馆演“放下你的鞭子”的剧，那卖唱的落难女子说：“我们跑到乡下，鬼子跟到乡下；跑到北平，鬼子又跟到北平；跑到上海，鬼子又跟到上海，到处安不得身，现在流浪来兰州了。天呵，我的家乡呵！”这说明什么？说明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敌人正在大刀阔斧向这边杀来。事实很明显：芦沟桥战起，敌人即向平绥路猛攻，很快就达到包头五原，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晋北突起，牵制了敌人前进，今天的西北，早已沦为战区了。然而敌人并没有放弃对西北进攻，这是他包围中国必须取得之地，不过他受了几次抵抗，采用稳扎稳打的办法罢了。稍留心战事的人，都知道日寇在打通津浦路以后，必

然一面由陇海路西进，直捣潼关，一面向宁夏进攻，截断甘凉大道。假如没有新的力量在豫鲁晋冀间给敌人以极大障碍，西北将不免一时与中央隔绝而成为单独作战之区。然而西北仍有不少的人，看不见这显明的事实，宋哲元刘汝明韩复榘等侥幸敌人暂不我攻而疏于防范的覆辙，甚至敌机在兰州几次轰炸，都没能使西北人惊醒。不能看见战时的紧张状态。不少的人，勾心斗角，不是为着抗战，是为着保持位置，反对那防范这。古语说：“燕巢危幕”，房子起了火，燕子巢在上面，在火没有烧及时，它们呢：喃喃象平时一样。我们是人，不是燕子，应特别警觉危亡大祸已临到了西北千百万人民的头上。急起直追，犹恐不及，还有闲情说别些事吗？

其次，战争已告诉我们很多经验。如动员民众，似乎谁也不再愿说不要动员了。但怎样动法？广西的经验告诉我们官吏不贪污，训练青年担任保甲，摒弃土劣，因此广西不要强迫而可出兵四百万，桂林初次动员八百人，报告抽签的近二万人。山西最近经验告诉我们：实行了扶植并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铲除中饱，不到一月，就普遍的民众武装起来了，给日寇以当头棒击，又江浙冀鲁许多工作团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众不能动的原因在那里，动员的阻碍是那些，民众不能动员给与抗战的损失有多大。动员民众的两付图画——好的坏的，很清楚摆在人们面前，西北因为距战地较远，得有运用别省经验的机会。不幸西北至今还少有人出来研究这些宝贵经验，定出西北动员的具体方针。甚至

还在想“真的民众动起来，怎么能控制得住？”于是过去那一套名动而实不动的官样方法，仍在作祟。

在最高领袖直接领导下的西北党政负责人们，他们是非常着急的。西北爱国青年及一切有远见的人们，应帮助着急。供献经验，提出办法。同时领导者也应旁咨博采，不耻下问。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西北家乡”的前提下，团结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不分党派阶级，紧急的准备起来，不能容再有松懈偷安的现象。把西北筑成很坚固的堡垒，守则不让日寇踏进西北一步，攻则可粉碎敌人于西北之外。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热血》四五期合刊）

三民主义与抗日救亡

雪 朗

一、首先须明了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三民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的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进行联结着而不可分，这是它的社会性。三民主义发生于资本主义走上帝国主义的初期而成熟于帝国主义猖獗之时，所以三民主义虽不能不是资本主义性的，同时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流弊，这是它的时代性。

二、三民主义的最高目的为救国，为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所以沦为半殖民地，是由于半封建的缘故。人民没有民主权利，没有改良的经济政策。国内的封建压迫与国外的帝国主义压迫勾结一起，所谓“以华制华”扶植并通过封建阶级以压迫剥削民众。所以要反对国外压迫必先铲除国内障碍。即是说要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建设。孙先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说的清楚：“……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耿耿然欲起而分其馀，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趋于憔悴，国民党不得不继续努力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以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于任何

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确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的自由独立，始有可望也。”

“……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有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尽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为个人或团体皆不得有此等自由权利。”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识，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待全国工人农夫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加入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运动之进行。……”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孙先生提出而为全体代表通过者，其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为国民党最高经典。很显然的三民主义他有连环性，缺一不可，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则为“中国之自由平等”，所以三民主义，一名救国主义。

三、如上所述，三民主义是联合一切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质言之：“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都应是三民主义的执行者。所以国民党本身即是“统一战线”，现全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即是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十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了第一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造成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后因分裂而使民族革命受到挫折。团结是我之利，分裂是敌人之利。孙先生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即是说反帝国主义高于一切，一切国内矛盾，皆应在反帝国主义——在今天皆应在抗日前提下得到解决。其条件为有利于抗日，至少不妨碍抗日。

有些人把民族统一战线，看成人民阵线，固是绝大错误；而把民族统一战线看成不是国民党所固有，与三民主义多少有些差异，也是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

四、三民主义是根据世界进化原则来的，其终极在于世界大同。“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次大会宣言）。帝国主义压迫我，我是要抵抗的，不屈服的。但同时我即强盛，也决不去压迫人。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不对，中华汉族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也不对。孙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致苏联遗书：“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帝国主义制度下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真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惟求所以适合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得享有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

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第一次大会宣言）关于民权主义的内容，则在对内政策上明白规定：

“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人所操纵。欲践民权之主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这是民权主义的真义。

民生主义的最要原则：一为平均地权。“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

（第一次大会宣言）所以平均地权之最终目的，为“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上）。“又农民缺乏田地沦为佃户，国家当给以土地，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郊。缺乏资本，因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国民党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同上）。这是民生主义的真义。

于此可得一断语：三民主义目的是救国。因此民权民生，一方面以巩固和加强国内的统一战线为限度，过与不及，均所不许，一方面适应世界进化之趋势，使能循序以进，达到社会大同。”

五、三民主义真义如上述。有人说在抗日的今天：民权主义不能讲，因为妨碍政府权力的集中；民生主义不能讲，因为怕削弱政府的财政。我想，这种说法至少有下列错误：第一，在日本军阀方面说，是对的，因为侵略战争违反了日本大众的意向，同时又要搜刮大众脂膏以供战费。所以民权民生均不准讲。我国则恰恰相反，“保障并扶植一切抗日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以及武装抗敌的自由”，发展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在抗敌政府领导之下，政府权力将无限的扩大。同时实行合理负担，铲除中饱，安定民生，“百姓君足孰与不足”，抗敌财用，始能不匮。第二，如果说抗日时，三民中要减去“二民”，那无异说三民主义只是太平时的装饰品，而不是危亡时的救国主义，这简直是对孙先生的侮辱。

六、三民主义的党——国民党得政十年，没有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每个忠实于三民主义的党员也都承认。甚至缘故呢？却又都说不出。我以为最大根源，是为了解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性，常常把个别利益超过总的利益。比如日本帝国主义是全国公敌，而因为党派冲突，把这公敌放松了；民权民生是增长民族力量的条件，而因为怕在民权民生中发展了某党派的力量，于是民运不得不停止或统制，民生也只好放在纸上。等而下之，乃至于把个人或派系的权位，看得比国家还重。这样，失去了三民主义实现的基础，因而不得不把它搁在一边。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一点，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今日即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彼党此派，姑置不论，新旧仇恨，一笔勾销。

七，我是个共产党员，有人说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为的是抗日，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我说：三民主义是抗日的，假如共产党不信仰三民主义，就谈不上抗日。毛泽东先生在共产党大会的报告：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苏维埃工农共和的口号……我们政策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么呢？他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与民主的革命分子，他是这些阶级民族与民主革命的联盟——”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又说：

“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